

全球對話

13.2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種語言刊出

與 Sidney Tarrow 談社會學

Angela Alonso
Breno Bringel

自由主義、他者 與宗教

Cécile Laborde
Azmi Bishara
Frédéric Vandenberghe
Anna Halafoff

振興社會理論

Mikael Carleheden
Arthur Bueno
Richard Swedberg
Anna Engstam
Nora Hämäläinen
Turo-Kimmo Lehtonen
Sujata Patel

理論觀點

Luna Ribeiro Campos
Verônica Toste Daflon

議題開講

- > 開放取用、掠奪性期刊或訂閱制期刊
- > 比哈爾邦的尋求健康行為
- > 西班牙的心理健康：社會學如何重要
- > 識別隱性暴力
- > 由 Khaldun 觀點談俄羅斯侵烏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3卷 / 第2期 / 2023.08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主編的話

這是我和 Carolina Vestena 及 Vitória Gonzalez 擔任主編以來的第二期《全球對話》，希望你們會喜歡。在擔任主編的最初幾個月裡，我們對於未來如何能讓這份刊物走得更遠、更廣，開啟了一系列的討論。我們將在2024年的第一期刊物中分享這些新的決定，也歡迎各位能讓我們知道你們的想法和建議。

首先，本期的人物專訪，邀請到了名學者 Sidney Tarrow，由 Angela Alonso 和我進行訪談。我們討論了社會運動與政黨之間的關係，以及其面臨的挑戰。例如：我們應該如何由「關係」作為切入點、社運政黨的潛力、近年來的政治事件和新的學術研究議程之間的關聯，以及全球研究議程所面臨的挑戰。

在第一個專題「自由主義、他者與宗教」中，我們收錄了將於墨爾本第二十屆世界社會學大會上發表的一些文章。其中，Cécile Laborde 從全新的角度分析國家和宗教之間的關係，並進一步探討了世俗主義和自由主義正當性之間的關係。著名的阿拉伯學者 Azmi Bishara 則分析自由主義在學術辯論中的改變，及其於政治中發揮的作用。Frédéric Vandenberghe 更從社會學內部辯論的視角出發，認為應當將思考社會學如何延續道德哲學的關懷——例如審查學科中的政治和道德預設，以及其中所蘊含的「自由主義的共產主義」的劇碼。Anna Halafoff 從世界主義與反世界主義互相對抗的脈絡切入，討論保守主義風潮和宗教民族主義的趨勢。

第二個專題是由 Arthur Bueno 和 Mikael Carleheden 籌辦，主題是「復甦社會理論」。除了簡要介紹外，本專題也收錄了另外六篇文章，討論我們應該如何復甦將社會現象理論化的學術研究。Richard Swedberg 和 Anna Engstam 認為創新是關鍵，Mikael Carleheden 則主張理論多元化。Nora Hämäläinen、Turo-Kimmo Lehtonen

以及 Arthur Bueno 的文章，則以不同的角度討論理論和經驗主義／實踐之間的關係。前者討論那些作為「大理論」的理論遇上了什麼危機，並提出將生活實踐或哲學中田野工作理論化的建；Turo-Kimmo Lehtonen 討論當代社會理論中實踐概念的矛盾；後者則討論社會理論中反殖民主義思想的發展，以及其對全球社會學的貢獻。

理論觀點的專題，以近期備受關注的話題為主要探討對象——女性對經典社會理論的主要貢獻為何？當前的時代如何為超越經典的追求帶來挑戰？在回答這些問題的同時，Luna Ribeiro Campos 與 Verônica Toste Daflon 不僅使得女性獻身於社會理論中，也促使這些關鍵議題在全球範圍受到討論。

最後，「議題開講」則收錄了五篇文章，他們分別處理了不同面向但互相關聯的當代議題，包括：開放取用、掠奪性期刊與訂閱性期刊的爭議 (Sujata Patel)；脈絡化的健康教育對於解決健康危機、疫情趨緩來說，扮演的關鍵角色 (Aditya Raj 和 Papia Raj)；社會學解決心理健康危機的能力 (Sigita Doblytė)；人權論述沒辦法處理複雜的性別暴力，以及承認隱微日常暴力的重要性 (Priyadarshini Bhattacharya)；還有針對俄羅斯侵烏事件，超越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批判性分析 (Ahmed M. Abozaid)。■

Breno Bringel,《全球對話》編輯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刊出，請至[官網](#)。

> 投稿來信寄至：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 編輯團隊

主編: Breno Bringel.

助理編輯: Vitória Gonzalez, Carolina Vestena.

副主編: Christopher Evans.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l, August Bagà.

顧問: Michael Burawoy,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媒體顧問: Juan Lejárraga.

顧問編輯: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Nazanin Shahrokni.

各國編輯

阿拉伯世界: (突尼西亞)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黎巴嫩) Sari Hanaf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io.

孟加拉: 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Bijoy Krishna Banik, Abdur Rashid, Sarker Sohel Rana, Md. Shahidul Islam, Helal Uddin, Yasmin Sultana, Saleh Al Mamun, Ekramul Kabir Rana, Farheen Akter Bhuiyan, Khadiza Khatun, Aysha Siddique Humaira, Arifur Rahaman, Istiaq Nur Muhit, Md. Shahin Aktar, Suraiya Akhter, Alamgir Kabir, Taslima Nasrin.

巴西: 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Ricardo Visser,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法國/西班牙: Lola Busuttill.

印度: Rashmi Jain, Rakesh Rana, Manish Yadav.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Elham Shushtarizade.

哈薩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Madiyar Aldiyarov.

波蘭: Aleksandra Biernacka, Anna Turner, Joanna Bednarek, Marta Błaszczczyńska, Urszula Jarecka.

羅馬尼亞: 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Bianca Mihăilă, Diana Moga, Luiza Nistor, Maria Vlăsceanu.

俄羅斯: 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臺灣: 李宛儒, 呂道詠, 洪柏勝, 廖宇雯, 黃翊碩, 簡芊楹, 郭智豪, 賴奕璋, 林韻柔, 周芸瑄.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知名學者 **Sidney Tarrow** 在接受 Angela Alonso 和 Breno Bringel 採訪時, 談到社會運動與政黨間的關係, 以及如何由此理解兩者。



此專題的主題為「自由主義、他者與宗教」, 介紹四位參加第二十屆ISA世界社會學大會主席會議著名學者的研究成果。



本專題分析社會學的**制度化和陽剛化**, 指出女性對經典社會學的貢獻經常系統性地被忽視, 以及其重要性與面臨的挑戰。

封面相片: 巴西聯邦參議院的屋頂。來源: Carmen Gonzalez, 2023。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目錄

主編的話 2

> 社會學對話

反思運動與政黨之間的關係：專訪 Sidney Tarrow
Angela Alonso, 巴西, 及 Breno Bringel, 巴西/西班牙 5

> 自由主義、他者與宗教

最小化世俗主義：一則辯護
Cécile Laborde, 英國 9

論全面性的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和意識形態
Azmi Bishara, 卡達 11

社會學作為道德哲學的延續
Frédéric Vandenberghe, 巴西 14

宗教國族主義與反世界主義恐怖主義
Anna Halafoff, 澳洲 16

> 振興社會理論

社會理論的現況
Mikael Carleheden, 丹麥, 以及 Arthur Bueno, 德國 18

在理論化時激發創造力
Richard Swedberg, 美國 20

理論化的方法：召喚多元主義
Mikael Carleheden, 丹麥 22

一起從事自由奔放的社會學！
Anna Engstam, 瑞典 24

大理論之後：哲學何以田野？
Nora Hämmäläinen 和 Turo-Kimmo Lehtonen, 芬蘭 26

理論與實踐之終
Arthur Bueno, 德國 28

實踐反殖民社會理論
Sujata Patel, 印度 30

> 理論觀點

社會理論經典下的女性
Luna Ribeiro Campos 和 Verônica Toste Daflon, 巴西 32

> 議題開講

開放取用、掠奪性期刊或訂閱制期刊
Sujata Patel, 印度 34

為了給印度比哈爾邦更好的尋求健康行為
Aditya Raj 和 Papia Raj, 印度 36

西班牙的心理健康：社會學如何重要
Sigita Doblyte, 西班牙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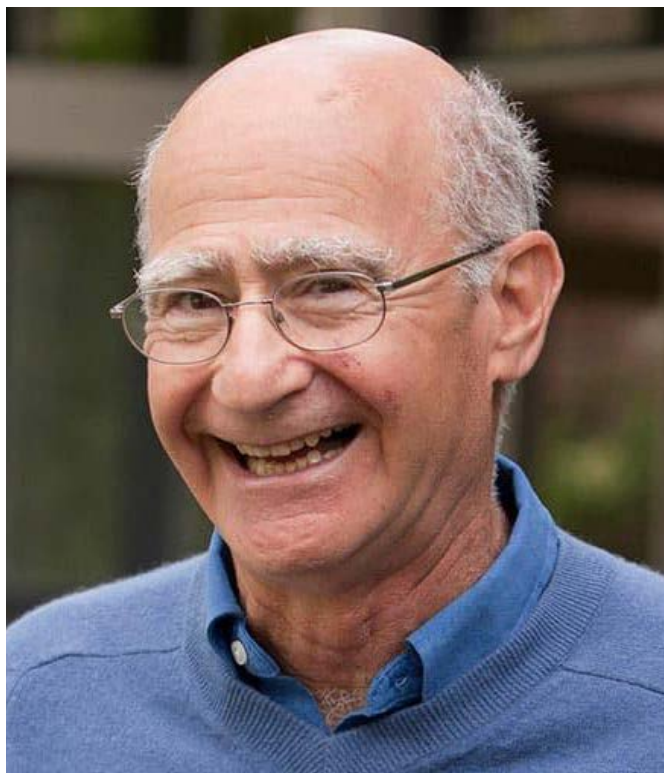
透過識別隱性暴力擴展人權論述
Priyadarshini Bhattacharya, 印度 40

由 Khaldun 觀點談俄羅斯侵烏
Ahmed M. Abozaid, 英國 43

『在高度公眾參與的「政治週期」時，很可能同時出現反民主和親民主的現象。』

Sidney Tarrow

> 反思運動與政黨之間的關係： 專訪 Sidney Tarrow



Sidney Tarrow 是康乃爾大學政府系 Maxwell M. Upton 名譽教授，專長領域包含社會運動、爭議政治與法律動員；並以政治社會學及比較政治研究聞名。他卓越的學術生涯，可以回溯至1960年代。自那時開始，Tarrow 便持續地在社會運動領域中耕耘。去年，他的著名作品《Power in Movement》也重新編輯、出版，其中新增了一些章節，並在新版的結論中談及了近年來的社會事件，以及最新的學術發展。他最近也發表了《Movements and Parties: Critical Connec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劍橋大學出版社，2021)，並嘗試在書中回答以下問題：社會運動如何與政黨議程交織？社運與政黨結盟時是被收編，還是擁有了更強大的改革力量？雖然這本書以美國政治為主軸，不過其中的分析仍為相關領域貢獻良多，也是我們會在這次專訪中著重討論的主題。

這次訪談中，由 Angela Alonso 和 Breno Bringel 擔任訪談者，兩人皆來自巴西，是優秀的社會運動學者，在國際上也頗活躍。其中，Angela Alonso 於聖保羅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其研究與作品多關注文化與政治行動間的關係，以及社會與知識運動；《The Last Abolition: The Brazilian Antislavery Movement, 1868-1888》(劍橋大學出版社，2021)即是她的作品。Breno Bringel 則是里約熱內盧州立大學社會與政治研究所的政治社會學教授，同時於西班牙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近年來以社會運動、生態社會轉型以及拉丁美洲思想為研究焦點。他也正準備與 Miriam Lang、Mary Ann Manahan 兩人共同出版《Beyond Green Colonialism: Global Justice and the Geopolitics of Ecosocial Transitions》(冥王星出版社，即將出版)一書。

Angela Alonso 和 Breno Bringel (AA & BB): 您可以為我們簡單總結一下，從關係性的視角切入運動與政黨的議題，有哪些優勢和困境嗎？

Sidney Tarrow (ST): 要清楚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先回顧我之前那份關於1960年代義大利南部的博

士研究。在像我這樣的年輕進步主義者眼中，運動是發生在政體之外，且是好事；而政黨則身在政體內部，且是壞的。但是，在瞭解了農民運動於二戰後在當地爆發，並看見共產黨與農民運動間的關係時，我才發現這樣的理解似乎是錯誤的——雖然在南方的政黨有著運動的性質，這樣的現象並沒有在北方出

>>

現，反而，其背後有結構完整的工人運動支持。這個政黨在南方農村地區遇上的問題，是他們採取了一套為發達工業國家量身定做的策略。我的第一本書《Peasant Communism in Southern Italy》出版於1967年，就是試圖討論這個問題，釐清這個政黨在北部和南部為何有如此差距，並解釋其在南部地區為何失敗。

二十年後，在 Charles Tilly 和 Doug McAdam 等人著作的啟發下，我再次將視角轉回義大利，希望《Democracy and Disorder》(1989) 這本書中，採用當時新興的抗議事件分析法，以釐清1960、70年代中發生的辯論。Alberoni 等社會學家仍將運動視為政治之外的事件，但我和他們抱持著不同看法。我發現，在街頭上發生的事情，和政黨系統中的事件有深厚的關係。這兩次經驗促使我後來參與了「政治過程」這個社會運動研究方法的創立。

最近，另一個二十年又過去了。由於對川普當選總統感到恐懼，我離開歐洲，並與 David S. Meyer 合編了《The Resistance》(2018) 一書，並在其中對反川普的抵抗運動進行研究，接著又著手籌備我們在這次採訪中討論的《Movements And Parties》一書。在這本書中，我指出運動和政黨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影響美國民主化的關鍵——有時使得民主化擴大，有時則對其帶來威脅，比如現在。

總結這些經驗，我發現研究運動和政黨之間的關係帶給我的優勢，是讓我得以跳脫政黨的制度世界看待問題，這也協助我理解，為何政黨的行動方式往往對他們的選舉造成不利——這是因為他們試圖讓自身符合於更多運動的意識形態。這麼做的困難之處在於，我試圖和兩種使用不同方法的研究傳統對話，他們分別以各自的方式看待政治制度。比起在拉丁美洲，這在美國似乎更容易被認為引起「麻煩」——這也許也解釋了為什麼我的著作在你們那邊有更正向的回饋。

AA & BB: 近年來，有種理解政黨與運動間關係的方式，是討論運動政黨的概念。你對這概念持什麼立場？

(ST): 在歐洲，Kitschelt 已經在他2006年的文章中對這個概念進行了狹義的定義，主要指的是西歐綠黨。2017年，della Porta 則和一些人在他們關於反緊縮運動政黨的書中，作出了更廣泛的定義。和我的概念最接近的，是 Santiago Anria 最近有關玻利維亞 MAS 的書。

這個概念——簡單一點說——在拉丁美洲比在美國更為人所知，但正如我於書中所說，運動政黨不斷地在

美國歷史中出現——從1850年代廢奴主義者和共和黨之間的關係中，就已經可以看見，而 Angela 也在其談論反奴隸制的著作裡指出了這點。

若要分析性地定義這個概念，就必須從許多面向各自談起。如我在書中所言，政黨主要是具有交易性質的，因為它們總是追求權力；運動則更具意識形態的性質。這意味著，一個運動政黨同時具有意識形態和交易的特性。為解決這樣的矛盾並生存下去，運動政黨會轉向制度化。若是不這麼做，運動政黨經常走向分裂——就像1890年代美國民粹黨那樣，當時一個派系支持民主黨候選人 William Jennings Bryan，而另一個派系則堅定主張其農業運動策略。

像玻利維亞人民運動黨這樣的例外情況很少，而且這很大程度取決於其組織形式如何能適應其運動與政黨特性。在美國，民主黨於1930年代持續保有這樣的雙重性，當時以勞工為基礎的派系在北方取得主導，而種族隔離派則在南方握有主導權。但這最終還是導致了分裂，更進步的一派在1960年代加入民權運動，而種族隔離派則加入共和黨，一直到今天。

AA & BB: 你的書也強調了運動和反運動間動態互動關係的重要性。在談到川普現象以及支持、反對他的運動時，這種方法在書中流露出某種戲劇化的語調。美國當代的政治衝突如何影響你的研究議程，以致你決定在這本書的關鍵段落中討論這個話題？換句話說，您如何看待當前政治事件與學術議程間的關係？

(ST): 多數關於反運動的學術研究，都將焦點集中在右派運動上，但我發現這種方式已經逐漸減少。在美國，這種情況在針對茶黨和近日「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研究中很常見；這兩個運動多被認為是以那些受社會、種族變遷影響的人們為基礎。另一個常出現的描述方式，則是介於高度和低程度的政治化之間。義大利人如 Alfio Mastropaolo 便強調許多極右派選民有著反政治的特性，川普支持者就經常聲稱他們喜歡他的原因，是他「不是一個政治家」。

我在書中使用了「反運動」(countermovement) 這個概念，正如 David S. Meyer 和 Suzanne Staggenborg 在他們1996年的重要文章，是為了更好地描述特定運動的興盛——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如何引發另一個反對運動的興起。舉例來說，在我們共同著作的《The Resistance》中，David Meyer 和我便指出反川普運動的興起是一場反運動。

不管是對左、右派的反運動而言，特別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總是被他們反對的運動的論述和

>>

行動所限制。例如，美國反疫苗運動的反科學言論，影響了支持疫苗運動，後者利用醫生、科學家和公共衛生專家的證詞，來對抗反對者的反科學意識形態。

但許多這些運動都是由既存的、更廣泛的意識形態運動陰影之下發展出來。例如，當社會科學家追蹤疫情的住院率和死亡率時，他們發現這些數字跟選民對川普主義的支持率密切相關。那些川普得票佔多數的州，同時也有著最高的疫情住院率和死亡率。這些政治事件確實影響了學術議程，而我們需要為事件提供答案。

AA & BB: 許多社會科學家認為民主和專制是起因於社會的類型不同。後來，一波研究強調，特定的「政治文化」對於國家走上專制或民主的政治道路，要負更大的責任。你在書中試圖尋找一個能解釋運動、政黨間相互作用的政治機制，且同時以智利、義大利、韓國和美國等文化差異很大的幾個國家為對象，而沒有提及特定文化中存在的價值觀或信仰所可能造成的影響。我可以說，你在這本書中，對於政治文化的概念抱持著質疑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回到我職業生涯的開端。當時，Gabriel Almond 和他的夥伴一起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他們將美國視為對民主規則共識大於政策分歧的「公民文化」；並將義大利定義為在基本原則上缺乏共識的「主體政治文化」。他們的義大利同事 Giovanni Sartori 則更進一步將義大利定義為「離心民主」，對應著英國或美國的「向心」民主。這些人認為，民主的最大威脅是共產黨，而如前所述，我曾經在義大利南部深入研究過當地的共產黨。在比較所謂的「離心」共產黨和中間派基督教民主黨選民對民主的態度後，我嘗試檢驗這些觀點，發現前者對民主的信心要比後者大得多。從那時起，我就開始質疑以政治文化為基礎的民主定義，並開始研究，到底是什麼因素，破壞或維繫著民主的運作機制。

在《Movements and Parties》一書中，我簡單回顧了後 Pinochet 時代的智利。北美作家認為，智利之所以成為了「強大」的民主國家，是基於強大的政黨制度和選民的民主信仰體系。但正如你們所知，智利的政治體系中幾乎不存在縱向的問責制。問責制是確保民主的關鍵，而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個制度實際上的作用，比鼓吹政治文化重要性的人所認為的要弱得多。因此，不管在學術生涯的最初和最後期，我對於政治文化的重要性一直都抱持著懷疑立場。

AA & BB: 正如 Tilly 所言，運動和反運動也跟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的過程有關。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

將這些過程視為不同時期的一波又一波風潮。但是，我們應該要如何將其至於同個時期中，來處理爭議政治的模糊性、複雜性和矛盾因素，又或著說，處理特定面向中的民主化，還有其他面向中的非民主化議題？

(ST): Tilly 是北美民主學者中，少數同時也涉獵社會運動研究的人之一。讓人驚訝的是，在針對當前美國民主危機的這波研究風潮中，從未有人提及他的著作《Democracy》(2007)。這本書啟發了我，讓我回頭關注自己過去有關運動與政黨的研究，以及民主化、反民主化間動態關係的研究，並在兩者之間開啟對話。

透過研究歷史案例，我發現支持民主和反對民主的運動，經常在同樣的關鍵時刻發生。用 Breno 在其著作中使用的概念來說，我認為在高度公眾參與的「政治週期」時，比如美國目前的政治週期，很可能同時出現反民主和親民主的現象。

在撰寫《Movements and Parties》一書時，我就發現美國歷史上有幾個類似的交織點。首先，隨著20世紀早期婦女選舉權運動的發展，一場反對婦女選舉權的運動跟著興起。其次，1930年代的大蕭條既引發了民主運動——羅斯福的新政——也出現了一些反民主的運動，比如電台牧師 Coughlin 神父的反猶運動。當然，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也是一個例子，其促成了反黑人權利運動的出現。這些不僅僅是運動／反運動之間的互動關係——事實上，雙方的行動，都是以自身認定的民主為名。

讓我用於2021年1月6日襲擊國會大廈事件中達到高潮的、川普／反川普之間的動態關係，來為這個問題收尾。在那個場合之下，許多像我這樣的進步人士，將協助川普發起「autogolpe」(這個詞還因此成為英語用詞!)的暴徒，視為威權主義的展現。確實，川普及其支持者意圖推翻 Joe Biden 正當且全面的勝利。但是，仔細觀察襲擊國會大廈、支持川普虛假選舉主張的這些人，他們許多人的說法，都是以民主和自由的名義，辯護自身的暴力行為。

AA & BB: 談到當代社會時，您指出了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如何影響了集體行動。但是，你所屬的知識傳統，似乎已經將社會階級和政治行動間的關係放在一邊，即便這是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您現在如何理解這件事？

(ST): 你說的沒有錯，政治過程的方法，確實經常低估結構性因素在爭議政治中的重要性，像是不平等、

階級，甚至是資本主義。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像我這樣的學者反對新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傾向把所有形式的爭論，歸結為資本主義引發的連鎖反應（注意，這在很大程度上仍適用於 Immanuel Wallerstein 和 Giovanni Arrighi 及其門徒的世界體系方法）。對諸如機會結構等政治和制度因素的關注，導致我們低估階級和階級衝突造成的深層影響。

近年來，隨著 della Porta 和她的合作者針對大衰退與隨後歐洲緊縮政策的研究，人們終於重新重視起將階級和不平等是為運動動員驅動力的研究。包括美國學者 Jeff Goodwin 和 John Krinsky 等人的曼徹斯特學派，也在其著作中再次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解釋運動動員的萬能鑰匙。在《Power in Movement》的第四版裡，我也試圖在某種程度上糾正自己的方法可能產生的問題。

AA & BB：在這場訪談中，我們多次談到美國、拉丁美洲和歐洲之間的交流管道。幸運的是，如今相關的對話越來越多，而社會運動研究也變得更加全球化。你認為在當代社會運動中，如何能夠讓全球性的對話更多、更好？

(ST)：在一場短短的訪談裡面，我想要提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我認為：除了 Hansperter Kriesi 和 Donatella della Porta 等學者的細心研究外，我們缺少結構化的跨地區比較研究；此外，關於民粹主義運動如何攻擊、摧毀民主的跨國比較研究也較缺乏，僅有 Steven Levitsky 和 Daniel Ziblatt 等人試圖進行歷史的重建；最後，少數年輕學者已經在這方面進行了深具開創性的學術研究，然而關於運動與法律制度間交織的跨地域研究，仍然是較少的。

一定要猜的話，我覺得跨大陸運動比較研究的下一步，是要嘗試超越微觀和中層分析，並將視角轉向爭議政治的巨觀結構。Donatella della Porta 和她在佛羅倫薩的團隊，於經濟蕭條下歐洲反緊縮運動的背景中，已經開始邁出這一步；但除了他們以外，似乎很少有人試圖由巨觀結構切入。這樣的方法是前幾十年社會運動研究的傳統，同時也結合了當今政治過程方法的精髓。我很期待下一代學者能朝這個方向努力，並且取得進展。■

來信寄至：

Sidney Tarrow

<sgt2@cornell.edu>

> 最小化世俗主義： 一則辯護

Cécile Laborde · University of Oxford · 英國



| Arbu 繪製 · 2023°

自由主義盛行的國家，應該是世俗的嗎？自由主義是否應該嚴格要求政教分離？事實上，上述的問題不只存在於學理的討論；雖然在西方世界多數國家皆為世俗的，也允納各種各樣的宗教形式與機構。然而，這件事並不具普遍性。其實絕大多數人們生活在神權政治下（也就是宗教被嵌入國家制度），抑或居住於一個宗教成為人們集體政治認同的國家中。例如，埃及、以色列、土耳其、印度、印尼和波蘭等不同的國家，他們政治和宗教緊密聯繫的方式即讓人無法相信任何簡化、世俗的政教分離的模式。而這些國家制定法律時，也時常參照當地的宗教傳統，並且為宗教的成員提供物質和象徵性的好處，且在性以及家庭議題上遵照保守的規範。如此一來，值得我們思考的是：他們是否不具有成為自由主義國家的正統性呢？遵守政教分離，

以保有國家最低限度的世俗性這項規範，又該不該成為判定一個國家是否為自由主義國家的準則呢？

在我的《Liberalism's Religion》一書中，對於以上論點有深刻的討論：我認為，世俗主義是一個比人們普遍認識到的更複雜的政治理想。我對世俗主義的不同分支進行梳理與分析，並展示了它與我們（西方）稱之為的，在宗教的不同層面之間的關係。我並非提出較為表淺，例如：世俗主義可以旅行嗎？的這種問題——我從自由民主的理想出發，並假設其不以種族為中心；人權、自由、平等和民主，才是眾人所渴望達到的目標。接著我提問，國家與宗教需要保持多少距離，以及怎樣制度形式上的分離才可能達成上述的理想呢？簡而言之，我提取了自由民主制的最低限度世俗標準。

>>

> 四種理想自由民主制度的特徵

我認為，以法國、美國這種嚴格區分國家和宗教的模式為自由民主制的唯一標準，是錯誤的。世俗主義應該被更廣泛且多元的範疇所定義。以最低限度的世俗主義標準來看，具正當性國家、包容性的國家、有限度國家和民主的國家四種國家制度中，皆存在著自由民主的理想。更甚，每種體制都點出了宗教的不同特徵，分別為：宗教的不可觸及性；宗教的脆弱性；宗教的全面性；宗教的神權性。接下來，我將依序分析上述的論點。

具正當性的國家強調，國家官員只應透過訴諸公共可及性的理由來證明其行動的正當性。在最低限度的世俗主義理論中，只有國家官員才有義務提供公共理由：世俗主義是對國家行動和理由的一種限制，而不是公民的義務。國家官員不具有訴諸神聖教義的權威，或以個人啟示來強制要求公民順從法律規範的合理性。可及性的概念，定義了在特定社會中的公民需要分享什麼，使得對於解釋法律的公共討論成為可能。重要的是，不會出現「只有」宗教思想被禁止存在，或是禁止「所有」宗教思想存在的情況——強調可及性概念的體制，並不會將否認宗教存在的事實。

包容性國家強調不應該將國家與特定宗教認同聯繫起來，以免剝奪不同信仰人士的平等公民地位。若政教合一侵害了公民的平等權利，國家象徵性地承認特定宗教將是一個錯誤的決定。本文將擴展討論宗教的範疇，超越僅討論宗教啟示和教義對個人的影響，深入探討宗教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包括文化、民族和種族等議題。作者認為，人們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是政治身份上的分裂，以及社會階層上的處於弱勢的情況。因此，顯而易見的是，當這些身份成為許多國家難以應對的政治問題，或者導致國家的脆弱和分裂時，一個自由主義國家理所當然地不能成為基督教或印度教國家。相反，當宗教不成為社會分裂的因素時，就不再需要執行政教分離的理由。

有限國家借鑒自由主義國家不應該對公民實施全面的生活倫理的想法。自由主義價值觀在宗教層面強調宗教的全面規範，包括教育、性行為、飲食、工作、衣著等方面。然而，許多當代公民擁有的權利，如自由行動、言論自由和生活自由，是在與傳統宗教權威的抗爭和鬥爭中贏得。例如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自由主義的浪潮推動許多相關法律的制定，如婚姻自由、保障婦女權利和性行為等。此外，在當代非洲和南北美洲，墮胎和同性戀權益引發了激烈法律論戰。然而，宗教不僅具有全面規範個人道德的功能。事實上，傳統宗教還注重集體規範，如節日，提供人們相互協調和合作指引，這些規範對個人自由的威脅相對較小。

最後，民主國家的存在必要性在於解決公民對個人與集體道德、公共與私人、權利與善的界限分歧。John Locke認為，國家應該處理與「公民」利益有關的事務，而將靈魂拯救這種宗教性問題留給個人的私領域。然而，在與民事和宗教相關的事情上，例如教會自治、反歧視法、人的性質、家庭、婚姻、生物倫理和教育等領域，一般的自由主義原則並沒有提供明確且結論性的解決方案。在權力衝突的情況下，民主國家與教會爭奪解釋權力，結果顯而易見的是國家政府獲得了最終的主導地位。國家主導了不同領域的劃分，並擁有定義宗教和世俗之間界限的權力。我認為，這正是自由主義世俗主義的基本原則：劃分和界定成為民主的一部分，成為人民行使公民權利的一種權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討論必然涉及政治，無法將其歸結為神授或哲學上的解釋。

> 民主主權

因此，自由主義對宗教提出的最基本挑戰並非意圖在國家和宗教之間劃定明確的分界線，而是基於民主主權的概念。根據自由主義和人權的範疇，人們在各種議題上的意見分歧應該透過民主方式來解決。然而，重要的是要明確指出，民主並不同於多數暴力，它仍然需要充分考慮少數群體的代表性、權力分散和司法審查。如此一來，自由主義合法民主的概念允許國家與宗教之間具有更多的變化和安排，這一點比起世俗自由主義者或持有特定宗教觀念的自由主義者更加寬容。

正如大多數世俗主義者堅信自己對國家和宗教之間界限的概念一樣，宗教信仰者也是如此。只要信仰者遵循三個自由主義原則：合理性、包容性和個人自由，他們也會尊重他人的信仰。在世俗化的社會中，國家法律自然而然地促進多數人世俗倫理的規範，例如通過政策和法律來消除傳統家庭和婚姻結構，擴大有關人權和反歧視的法規。而在最低限度的世俗主義約束下，即使宗教信仰者在一個社會中佔多數，他們同樣可以在公共領域中塑造他們所想像的社會。除此之外，最低限度的世俗主義並不試圖為政治、公共事務、私人領域以及相關道德問題提供標準答案，也不具備這種野心或可能性。■

來信寄至：

Cécile Laborde

<cecile.laborde@nuffield.ox.ac.uk>

> 論全面性的自由主義、 政治自由主義和 意識形態

Azmi Bishara, Arab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Studies, 卡達



布面，以油彩、丙烯繪製。
來源：Bela Righi ([instagram.com/belafrighi](https://www.instagram.com/belafrighi))，2020。

在當代社會，關於全面性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之間的區別，引發了激烈的辯論（尤其在學術界）。然而，這兩種觀點都避免了將自由主義思想實際應用在施政上的必要性。就 Rawls 學派對於自由主義的分類而言，他們認為政治自由主義和全面性自由主義都是多餘的。原因在於 Rawls 將政治自由主義的討論建立在自由主義原則之上，而這些原則本身已構成全面性自由主義的

大部分價值。然而，這些原則並不是全面性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而是其認識論的先天條件。另一方面，當將全面性自由主義單獨提出時，它不可避免地變成了政治自由主義。後者在實踐中類似於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也具有全面性。最後，任何學說的政治版本都必然比非政治版本更全面，因為它需要納入更多考量。

>>

> 初步發想

人們經常視政治自由主義為管理多元國家體系的一種模式，它既保護公民遵從和超越只強調完美生活的全面性學說的權利，又提供了合理論據來支持和保護這些學說。政治自由主義並不強迫人們接受自由主義教條，因為它假設大多數人同意憲法原則，並以此作為實踐的基礎。

對於執政的自由主義者來說，他們在政治上遵循自由主義的概念。然而，在執政之外，他們有權實踐他們對自由主義信仰的理解。只是，執政者無法完全按照全面性自由主義原則中對於「美好生活」的立場來管理國家，因為無論如何他們仍需要政府機構來實踐其政策。

根據 John Rawls 的說法，在理論或實證上皆無法證實：全面性的自由主義更傾向於透過國家強制手段施加於人。全面性自由主義（儘管我對此名稱有所保留）建立在對公民自由的承諾和限制國家權力的信念之上，支持此原則的人最有可能反對政府強制灌輸特定信念於人民。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自由主義者非常反對政府對社會的干預，同樣也強烈反對任何可能侵犯個人自由的國家干預。換句話說，自由主義者渴望政府能賦予人們行使自由權利的意圖是明顯的。因此，他們不僅會樂見社會福利政策的實施，而且會積極追求這樣的政策。

由於政治自由主義關注的是國家的運作，如果這個概念不被積極實踐，它的意義就會大幅減弱。此外，它也需要憲法的保障，以避免民主制度中可能出現的多數暴力情況。以近年席捲民主社會的民粹主義浪潮為例，非自由主義的右派利用民主的原則和規範，推動了與政治自由主義原意相悖的理念。更糟糕的是，他們煽動特定情緒在民眾中蔓延，使人們情緒化地敵視選舉落選者履行其工作的權利，並抵制憲法所提供的保障。自由主義與民主之間的衝突日益加劇，這是因為執政者必須在以自由主義價值觀為基礎的治理和朝向多數民意的治理之間做出選擇。而這種衝突自二十世紀，自由民主制度誕生以來就經常發生。然而，事實上這種危機也可能是良性的，因為它可以促使改革、重新調整現有制度。只是，改革成功的關鍵在於國家機構必須具有保護政治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能力。

對於自由民主國家應該具備何種條件，若僅有片面的解讀，可能會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例如，有一種觀點宣稱政治自由主義需要透過國家的強制執行（尤其在危機爆發時）；而全面性的自由主義則被視為一種次文化，甚至可能變成中產階級選擇性遵

守、捍衛或以不一致的態度觀察的價值觀。這種趨勢可能導致與社會中更廣泛的社會政治進程相互隔離。舉例來說，當試圖將政治正確觀點強加於社會時，所謂的全面性自由主義者則容易受到民粹主義和大眾聲量的影響，大眾甚至可能誤解這個概念為一種恩賜。

我認為，在全面性的自由主義中「美好生活」的這個概念，只適用於政府外的自由主義。如果我們試圖將意識形態強加給人們，而忽略了保障自由和個人自主權的重要性，那麼一切將成為自取滅亡的行為，並有可能陷入非自由主義的困境。

政治自由主義可以被視為一種經過實際執政考驗的自由主義，是權力統治下的自由主義形式。對於不同派系的自由主義者而言，在執政時都會遭遇不同的困境。學術界對於這些問題的探討已經相當廣泛（特別是在道德、政治哲學和法學領域），許多討論都牽涉到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程度、平等的含義，以及集體權利和個人權利的優先性等議題。對於集體權利概念的支持者而言，也存在著分歧。有些人認為這些權利源於個人的自願結社權，而另一些人則主張群體權利應歸屬於社區。因此，在群體內如何平衡個人與集體權利、以及群體權利是否應優先於個人權利的問題上，仍然存在分歧。

許多研究已經就上述議題展開辯論，這些研究涵蓋了數百本書和上千篇文章。在我所了解的範圍內，很少有問題比這更「全面」，並且這也是自由主義所面臨的挑戰。在研究政治自由主義時，倫理判斷的方法可能存在差異，確實有一些不同之處。從這個角度來看，政治自由主義更具全面性，因它考慮了個別社會和國家在生活的各個方面之差異。此外，它必須與全面性自由主義之間的價值觀和實踐關係抗衡。

> 進一步思考

上述的結論與從威權體制下的生活角度得出的結論一致，在體制外的自由主義仍然可以被歸類為政治自由主義。這樣的歸類是有可能的，因為政權內部可能出現擴大言論自由和公民自由範圍的改革方案，或是受到政治反對力量的要求。

在國家社會的層面上，自由主義的思想、原則和生活方式在理論上可能與威權主義的做法產生衝突，實際的例子包括個人道德自主、公民權利和個人自由（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然而，同時它們也可能與其他反對派產生衝突，這些反對派試圖改變治理體系，並試圖透過國家來強制推行他們的信念。

自從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解體後，世界上大多數的專制政權已不再是極權主義，因為他們不再將一個全面性的意識形態強加於社會和機構。如今，這些政權往往通過主權原則、國家利益、安全和穩定等理由來辯稱文化與民主不相容，並越來越多地引用西方自由主義的失敗論述來證明他們存在的意義。所有的專制政權都需要大量施加生理和心理暴力來維持統治的穩定。一般來說，雖然仍有一些反對派群體堅持全面性的非自由主義理論，但他們處於權力場域的邊緣。然而，當局仍能利用他們來阻止變革。

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發展。自由主義並非僅以全面性或政治性的形式存在，而是分成兩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支持政治和公民自由、反對專制主義原則。第二個版本則關注個體，強調個人自由和生活方式的選擇（在這裡我不考慮將自由主義討論局限於經濟領域的新自由主義者，因為我認為他們並非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然而，矛盾的是，後者關於個人自由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主義似乎更容易與現有的獨裁政權相容。即使政權壓制政治活動和公民自由，對個人自由的關注卻相對較小。

當專制國家中自稱自由主義支持者們從政治的角度思考時，他們可能會得出這樣的信念：他們應該推緩在政治層面爭取個人自由的議題，取而代之提出一個自由主義的政治治理政策。這個政策承諾政治的多元化，為不同全面性學說的支持者提供討論的空間，並保護公民權利和個人道德自主權。然而，這種做法被證明只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形式。僅僅關注推翻現有政權，而不努力爭取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只會讓那些為了選舉目的而推崇政治多元化的人受益（至少對於政治精英來說是如此）。最終，我們會發現這種做法並非為了保護自由或個人道德自主而在前進。

重要的是，在專制政權被推翻後，無論這些政治精英在理論上有何分歧，他們仍然展現出政治自由主義原則的存在。然而，由於主導性的大眾文化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專制統治後，不容易支持並宣揚類似於自由主義憲法的政策。因此，公民和政治自由受到限制，無法在公共文化中紮根。

人們常說，自由主義是一種規範性的理論、倫理學的分支。在大學課程和學術會議的層面上，這樣的說法也許是合理的。然而，從社會和政治衝突的角度來看，自由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意識形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全面性的觀點才變得有意義。從哲學的角度來看，自由主義可能是抽象的、非全面的，儘管其論述相當複雜並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相反地，意識形態可以是全面的，儘管在極權主義或包羅萬象的教條意義上可能不一定如此。然而，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我們會發現它的全面性在於它與社會、生活和文化（如語言、宗教、習俗等）以及各個方面的人們的權益緊密相連。因此，自由主義能夠通過將自由與人民的文化、權益和愛國主義等意識形態相結合，以解決人民所面臨的問題。同時，它也能提出自由主義的政治方案，為個人和社會的解放之路提供支持。當這些討論超越哲學領域，並融入政治和社會衝突的現實情境時，自由主義就必須具備全面性，因為它與政治密不可分。由此，自由主義者呼籲我們應該將個人和社會從暴政中解放出來，同時不應破壞主流宗教文化而與人民疏遠。他們深知必須為經濟弱勢的階層提供解決方案，因為他們絕不會接受一個無法解決經濟困境的政治自由概念。同時，那些以改善個人生活方式為核心問題的自由主義者可以與世俗專制政權共存。相比之下，其他僅停留在討論市場經濟概念上的所謂自由主義支持者，他們卻忽視了日常生活中被侵犯的人權，或者只為了獲得貸款而一味追求金錢，全心全意想要說服執政的專制政府接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

來信寄至：

Azmi Bishara

<azmi.beshara@dohainstitute.org>

> 社會學作為道德哲學的延續

Frédéric Vandenberghe,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巴西, ISA 社會學理論研究委員會 (RC16)

社會學和天文學、生物學、埃及學一樣，是一個科學化的學科。學科是用以在科學內部區分出不同領域的重要單位。不過，這種將科學區分為不同學科的做法，是很晚近才出現的。一直到1750年，不管是全職還是業餘的科學家，都擁有各領域的知識，就如同百科全書那樣。十九世紀時，為了教育目的，人們才開始以學科的形式區分科學知識。

很長一段時間裡，科學一直是哲學的一部分。十六世紀，數學形式化與物理實驗化等趨勢，促使科學革命發生。十八世紀的第二次科學革命時，這些學科才從哲學中分離出來。自然哲學孕育了物理、化學與生物學；而道德哲學則被社會科學（如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取代。至於人文科學，則具有負面的意涵，其中涵蓋了一些被排除在自然與社會科學之外的學科。

社會學正是在這種將科學切分開來的時代背景中，隨著俾斯麥的德國洪堡大學革命以及拿破崙法國大學校的建立，於十九世紀的歐洲出現。作為歷史哲學的實證分支，社會學於德國的 Geisteswissenschaften、英國的道德科學（包括政治經濟學）、法國的政治思想的交織中萌芽。雖然社會學被以實證研究的形式制度化，成為了 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en，但其仍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廣義道德哲學的傳統。

> 社會學與道德哲學

道德哲學不僅涵蓋了道德、實踐與政治哲學，也涵蓋了歷史哲學。直到今天，社會學仍然——以 Paul Ricoeur 恰當但違反直覺的話來說——身在「後黑格

爾／新康德主義」的影子中。從社會學參照一系列系統化、互相關聯的概念，來定義社會、界定如何研究社會來看，其具有新康德主義的性質。同時，社會學也是後黑格爾主義的，因為其捨棄了絕對辯證，將分析限縮於特定社會機構的歷史發展，並崇尚客觀。

社會學確實是一門專門研究社會事實的學科。但，社會學其實原先並不只是一門社會科學學科，而是將幾個鄰近學科結合為涵蓋範圍較廣的社會學，的一門「超級學科」(super-discipline)。用現在的概念來說，就是形成了一種社會理論。在法國和德國，社會學都被認知為一門超級學科，其將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以及社會科學跨其他學科的研究，統整為具有道德正確、政治參與性質，且避免落入目的論與形上學的實證歷史哲學。

> 重新建立社會科學

回顧社會學的史前史，是因為我認為我們如今需要將整個社會科學重建。這門學科與外界的互動減少，和哲學、人文學科的距離越來越遙遠，在自身方法和資料的限制下，難以解釋世界和社會的變遷。社會學不僅沒有辦法跟上數位化帶來的一波又一波社會變遷、難以預料各種危機的出現，更無法於理論層面給予提供社會學許多動能的社會運動任何幫助。面臨這些困境的社會學，如今已經失去了對理論的野心，甚至切斷與自身的命脈——哲學之間的連結。

在美國和法國，出現了一波提倡中層社會學理論的風潮，但我認為這對於社會理論的衰弱，並沒有實質的幫助。社會理論如今已由社會學範疇中出走，而歸屬於普世意義（而非法蘭克福學派的市政意義）

>>

「如果社會學中有針對社會學道德與政治前提的研究，其將揭示社會學對於社會不正義與社會病態的批判，仍然不脫離「自由社群主義」的窠臼。」

上的批判理論，以及以後結構主義為關懷、跨學科的「研究」(Studies)。我和 Alain Caillé 共同撰寫了《For a New Classical Sociology》，在書中我們提議，要在社會理論、道德和政治哲學，以及「研究」間建立一個新的聯盟。我們期望哲學、社會科學和新人文科學能夠在社會理論領域中重新被定義，而社會科學也可以符合自身的方式延續道德哲學。

在進化論的社會發展論述中，我們經常能看到歐洲中心主義的蹤跡；而歷史哲學則預設了歷史的存在，認為其將跨越時空的社會和人連結起來。即便人們不再擁護歐洲中心主義，也很難完全避免落入歷史哲學預設的窠臼。幸運的是，從後黑格爾歷史哲學轉向新康德歷史哲學，是一條正確的道路。現代性既是一種預設，也是真實存在的；而對社會學這樣一門與現代性密切相關的科學來說，歷史哲學在其身上留下的印記從未完全消失。

如果說在研究現代社會時很難完全擺脫歷史哲學，那麼完全拒絕現代性的規範性原則可以說是更加困難。作為現代性的產物，社會學傾向接受現代社會背後隱含的、主體性與自由的規範性原則，這些原則也持續影響著科學體系的形構。社會學研究道德個人主義的社會前提，並不是為了否定規範性原則，而是為了理解其制度化的過程。當這些原則在實踐中被否定時，其正當性反而在批判異化與歧視的過程中被強化了。

如果社會學中有針對社會學道德與政治前提的研究，其將揭示社會學對於社會不正義(歧視)與社會病態(異化)的批判，仍然不脫離「自由社群主義」的窠臼。有時這些批判更傾向於認同與真實性的社群主義極端，其他時候則倒向自治與正義的自由主義極端。當社會學面臨威權主義或「獨裁主義」政權的攻擊，重新確認學科的基本原則便是極為關鍵的——如此才能避免這門學科隨著它本該分析、捍衛的世界一同消失。■

來信寄至：

Frédéric Vandenberghe
<fredericvdbrio@gmail.com>

> 宗教國族主義 與反世界主義恐怖主義

Anna Halafoff, Deakin University, 澳洲



| Arbu 繪製：2023。

宗教國族主義正於全球範圍崛起，其可能會對「他者」施予直接或結構性的暴力。一般來說，這裡的「他者」指的是文化、宗教、性別或性取向上的少數群體，以及非人的生命形式。人們經常認為宗教會被加害者濫用，不過一些以「神聖的矛盾性」為主題的學術研究指出，即便宗教可能促使暴力發生，其也有促進和平的潛能。

> 男性支配的嚴重後果與保守風潮

宗教特殊主義與排他主義，指的是某些人認為他們走在唯一正確的道路上，且擁有接觸真理的權力，並因此抱持著優越感；這導致宗教群體與非宗教群體

>>

之間，以及與國家和其他行為者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衝突。許多宗教傳統中，都存在著「聖戰」的概念。因此，當人們感覺自己的宗教受到威脅時，便會認為自己可以合理使用暴力。在許多宗教的教典中，女性和 LGBTI+ 群體的地位是較低的。除此之外，一些人抱持著宗教高於法律的信念，這對兒童、女性和性少數族群造成了嚴重的傷害。絕大多數宗教領袖都是男性，而宗教的意識形態，也經常主張人類本就應該支配其他非人的生命形式。

有些人曾預測現代社會將出現世俗化的進程——即宗教的力量和影響力將日益減少，但近幾十年來，在世界上的許多地區，我們卻看到保守宗教、政治和媒體結盟的趨勢逐漸增強，並帶來了毀滅性的後果。

> 世界主義與反世界主義恐怖主義的反彈

藉著 Ulrich Beck 的研究，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理解此現象的有效觀點，即：這並非是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是世界主義和反世界主義行動者之間的對立。二十世紀的中後期是非常世界主義的，全世界對於人權、環境權和多元性等議題的重視程度都有所增長。從全球宣言、公約以及地方法律和政策中，這點是很明顯可以看到的，其保護少數族群和多個物種，使其免於受到傷害。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這樣的發展，因為這使得保守派（包括特定宗教團體和機構）的權力和特權遭到削弱。這便引發了反世界主義反彈，以及極端宗教運動和國族主義崛起，他們批評少數族群權益、自由主義和民主等價值，並呼籲回歸異性戀框架下的「家庭價值觀」。

舉例來說，我在2014年首次使用了「反世界主義恐怖」一詞，來形容 Anders Breivik 2011年在挪威發動的荒謬舉措。當時正值澳洲價值辯論的高潮，而 Breivik 發表的反移民和反女性主義宣言，引用了澳洲保守派政治／宗教領袖貶低穆斯林的言論。Brenton Tarrant 2019年在基督城發起的清真寺槍擊事件及宣言，也受到了 Breivik 的啟發，其背後帶有於歐洲、澳洲發展出來的反移民和白人至上主義觀點。

在印度，Narendra Modi 的威權主義印度教民族主義，也導致人們對穆斯林的偏見日益增加，並引發了支持 Hindutva 和其反對者之間的激烈衝突。更可怕的是，普丁以出色的網路宣傳，長期將自己定位為保守世界的領袖。普丁政權之所以穩固，是以俄羅斯和俄羅斯正教的特殊主義為基礎，而這樣的基礎當中，則蘊含著恢復俄羅斯昔日輝煌的危險願景。普丁和 Patriarch Kirill 在侵略烏克蘭及對抗西方的過程中，展開了一場殘酷的聖戰，藉著散播仇恨和假消息破壞民主國家，同時還提供其他反世界主義的領袖和極右派運動勢力支持。普丁的恐怖行動目前已經受到 Volodymyr Zelenskyy、烏克蘭人民及其盟友，以及俄羅斯的反普丁、反戰人士如 Alexei Navalny 與其支持者的強烈抵制。

> 我們作為(宗教)社會學家的當前職責

當反世界主義恐怖主義與暴力於全球蔓延，深入了解保守宗教、政治和媒體角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即是至關重要的；同時，作為社會學家，我們得跟更進步的宗教／非宗教和平倡者站在一起，透過有力的譴責和抵抗發揮自身的力量。社會學家從事社會關係和制度的研究，其中包含與社會平等／不平等有關的議題。多年來，國際上眾多的社會學研究，已經指出種族主義和歧視少數族群可能帶來的危害，也闡明了包容、歸屬對於個人以及社會的和平與福祉有何其重要。

宗教社會學家過去較關注宗教上的少數族群經歷了哪些歧視，以及其有何負面影響，卻較少揭發，或是實質上預防宗教與精神迫害。

近年來，人們已經普遍認同「宗教自由」的大旗，逐漸從抵制仇恨轉移到了合理化歧視觀點的行為手上。有鑑於此，作為社會學家的我們，也有必要準備好探究與宗教相關的一切仇恨和傷害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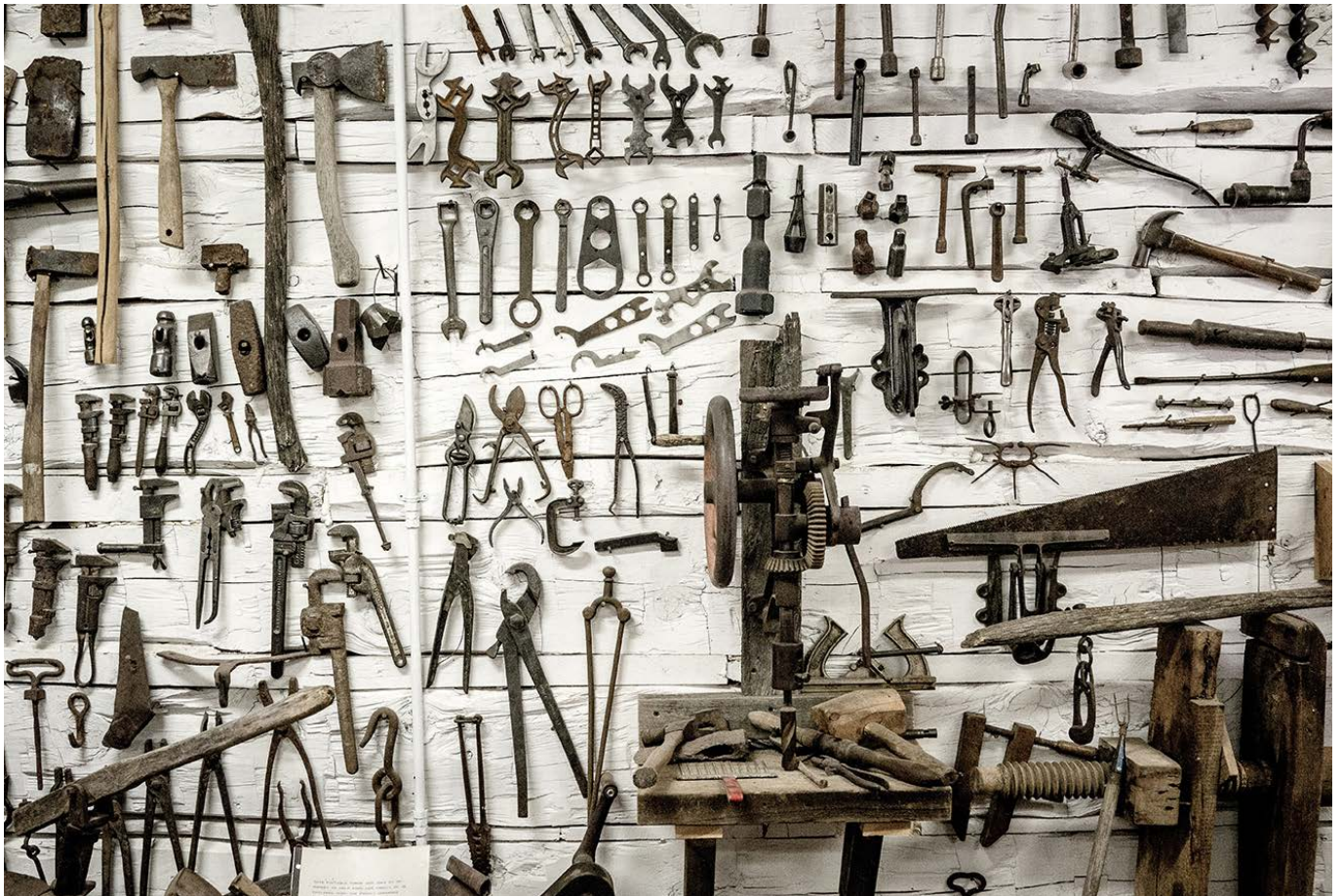
來信寄至：

Anna Halafoff

<anna.halafoff@deakin.edu.au>

> 社會理論的現況

Mikael Carlehed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丹麥, Arthur Bueno, University of Passau 以及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德國



來源: Lachlan Donald, Unsplash。

“在理論被理論化之前。似乎輕易地能區辨理論和理論化這兩組詞，其意思即是理論性產物以及生成理論的過程。然而，事實上這樣的區分敞開了一個全新領域的探索。當我們在理論化的時候，我們究竟如何去執行？有任何技巧可以操作嗎？它是一種技術、工藝抑或是一種理論化的研究方法？那我們又該如何去構思、發展與教授這項研究方法？最後，當我們提出這些疑問時，我們會感到非常震驚，因為這些問題在社會學的歷史中長期不被重視的。

提起這些疑問的動機是源自為了產出「[更好和更大膽的理論](#)」，進而試圖將我們關注的焦點從理論

轉移到理論化。然而，也有其他不同的原因，即理論在當代社會學地位中的式微。「[社會理論作為志業](#)」仍然可能嗎？看起來不只是「[理論的漫漫長夏](#)」早已結束；更甚，在國際社會學領域做研究的學者們發展社會理論的意願也不斷地「[遭到侵蝕](#)」。

只是，與其哀怨著現況，我們更應該去反思這個情況到底是如何發生的。當我們把視角放到整個二十世紀中主要的社會理論學者在學科建制裡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就可以更清楚看見社會理論所遭遇的現況。在上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裡已經出現了這樣的徵兆，而自此之後情況只有日益嚴重，如社會學相關學科的枝蔓衍派，以及對量化實證研究的重視。可

>>

以肯定的是，這個時期也標誌了新世代社會理論學者的湧現，然許多那個世代的學者也對宏大的理論化持保留態度——其中一個例子為 Bruno Latour，一個反對理論的理論學家。

其中，有個很好的理由說明這樣的轉變。隨著理論在學界熱絡發展的終結伴隨著在學科建制內部的淨化討論，包括多關注個別領域的特殊性，及凸顯常民行動者在構建社會學知識的貢獻。此外，也考慮到了不同語境下的知識生產促使對學科內部規範提出質問，及外部觀點的價值重估 (Bueno et al. 2022)。

另外，這樣的傾向並不僅僅在知識份子的論辯中成形，同時也帶來了機構內部對於學科體制的轉變。當宏大理論式微時，給予實踐理論問題的空間也在逐漸地消失。以社會理論作為學科專業的條件——換句話說，作為「常態科學」的一部分——已經逐漸被侵蝕。弔詭的是，對於宏大理論的批判強化了那些被註定被視為有問題的傾向。理論可能變成具有得天獨厚條件的偉大作者所獨佔的工作，此外風險更創造了在經驗研究和社會理論間一個比以往來得更巨大的鴻溝。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啟一個關於理論化方式的論辯則能被理解為實證主義論爭2.0的開始。

基於這些原因，我們認為去討論社會理論的現狀是非常關鍵的，其中並不是致力於返回過往的光榮（在許多層面上也不見得是光榮的），而是藉此去更加釐清不同理論化的方法和方式，和其在社會與政治上的影響。社會理論應該在社會學中扮演何種角色？這些理論化的方式與社會學裡不同的傳統、社會學知識有多大的連結？這裡是否有某些——或多或少指涉——理論化概念正在消亡，又或者有其他概念正死灰復燃呢？

就如同讀者所見，在此特輯中的這篇文章並不在為這個疑問提供一個標準答案，更不是意圖要回到過往的理論化模式或是忽略當前的挑戰，而是藉著多元精神探索如何振興當代社會理論的各種可能性。■

來信寄至：

Mikael Carleheden

<mc@soc.ku.d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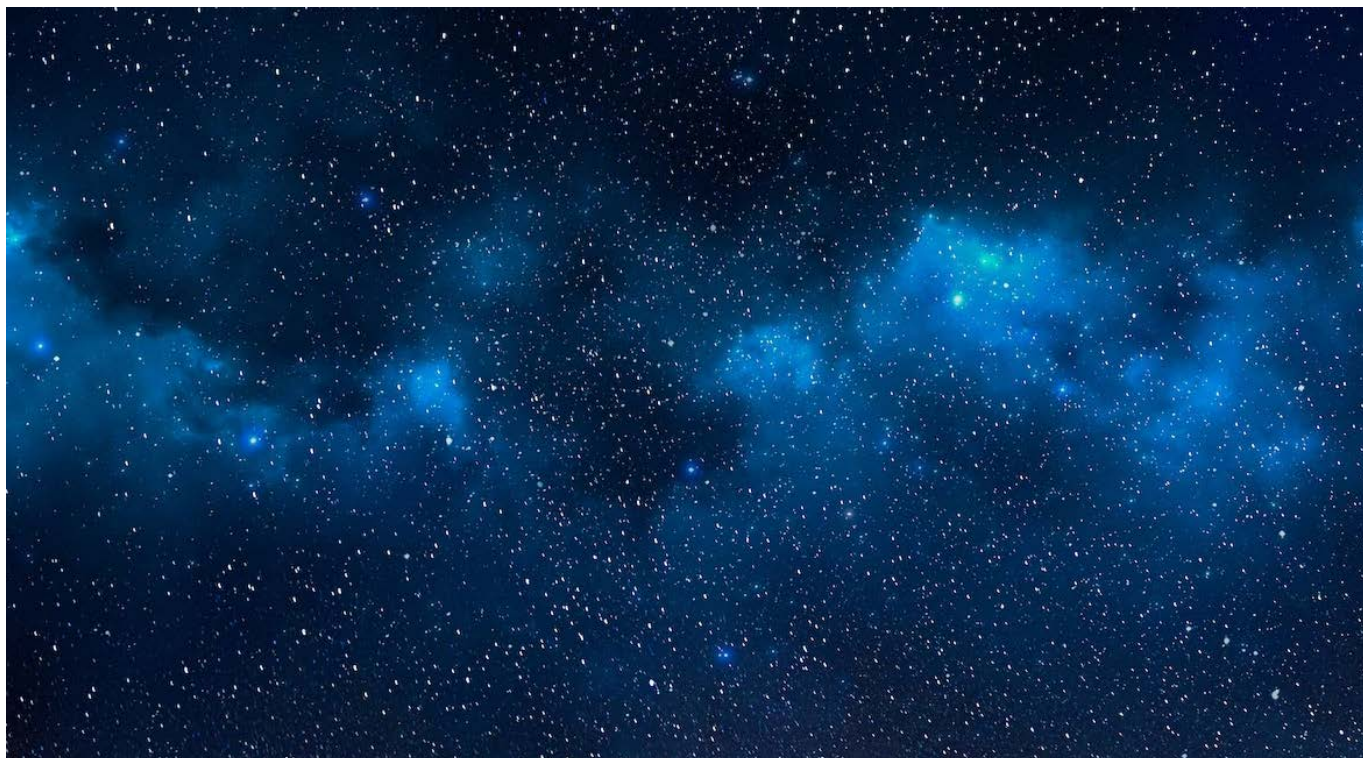
Arthur Bueno

<arthur.bueno@uni-passau.de>

/Twitter: [@art_bueno](https://twitter.com/art_bueno)

> 在理論化時激發創造力

Richard Swedberg, Cornell University, 美國



| 來源: Alex Lanting, Unsplash

要求你的理論化過程增加更多創意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這有可能嗎？如果有可能，那又該如何進行？事實上，多數人皆同意不太可能給定如何更有創意的方法。然而本文所想要討論的，是關於「激發創造力」這件事。也就是，你可以將自己放在一個你「有可能」會創造一些新東西和新價值的位置來進行思考。

對社會學家來說，如果想知道激發創造力的方法，自然而然的是去進行與創造力有關的社會研究換言之，我們可以由觀察在涉及知識探索及創造力的部分

所得出的結論中，哪些因素至關重要。但這不像聽起來那麼簡單，因為這些在社會學分析中被視為重要的因素，時常不能為個體所用。就如同 Gilbert Ryle 所闡明的，專業的「知識 (knowing-how)」並不同於「知曉 (knowing-that)」。

然而，似乎仍存在一種研究創造力的學科，以及將「知曉」轉變成「知識」的方式。我稱這個過程為「轉譯」，而本文章將探討一些為人熟知的關於創造力的社會學研究，並且試著將其中的「知曉」轉譯為「知識」。

· 研究一: Robert Merton 最知名的論點為: 創造力有時可以藉由意外而獲得; 或用個他提倡的詞: 機運巧合。舉例來說, Alexander Fleming 以意外發現盤尼西林為名, 當時在實驗中, 他發現有東西掉落在培養皿, 並且到這東西殺死了細菌。《The Travels and Adventures of Serendipity》這本書提到 Elinor Barber 也認為有種環境比其他地方, 使機運巧合更容易發生, 這個地方就是偶然的微觀環境。如: 加州 Palo Alto 行為科學高階研究中心 (Merton 協助設立的地方) 就是一例, 而另一個則是哈佛學會。

· 研究二: 網絡是現代社會學中一個非常熱門的研究對象。舉針對創造力的技術網絡分析為例, 其中一個研究為 Ronald Burt 的「結構洞與好點子」。此研究的基本論點是, 一個人如果可以同時利用兩個網絡, 當個所謂的中間人, 那麼位居此位的人比起他人更是身在一個適合創造力誕生之位置。舉例來說, 身為一位社會學家, 但同時也與其他不同學科的人合作如: 尋找與認知科學、生物學領域的專家共同合作。

· 研究三: 如何藉由網絡分析來解開歷史上關於創造力的秘密, 可以在 Randall Collins 大部頭的哲學史著作《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找到答案。這本書提及創造力是由三種層次的力量經由交互作用後碰撞出的反應, 而這個三個力量則為社會、組織與網絡。透過德意志啟蒙運動的例子, 我們發現: 社會的力量來自於法國大革命, 而組織的關鍵力量來自於柏林大學, 最後, 其網絡則是由康德和其他由學生、同儕組成的特殊結構。由此可見, 創造力網絡時常一開始來自於多個開放空間, 但隨後就難以尋覓尚未被佔領的空間。

· 研究四: 網絡有其擴散的邊界, 但團隊並沒有, 其在當代科學的角色中也不盡相同。一個由行為科學家 James A. Evans 和其同事發表重要的關係研究, 刊登在2019年的《自然》期刊中, 研究是關於在團隊中的數個科學家與其創造力。他們發現在非常小的團隊與獨立研究者比起研究團隊更容易具有顛覆性

的研究發現, 然而大型團隊更擅長於常規科學和次要的發現與追求團隊計畫的存續有關。

> 如何激發創造力

在本文一開始, 我指出單一個人無法為創造力開立處方籤, 要激發創造力才是可行的。我也宣稱多數關於創造力的研究多關注在「知曉」, 而「知識」才是最需要的。其中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認為是透過我稱為轉譯的過程; 而現在就是展現其如何可行的時刻了。

現在你需要做的就是, 找到任何可能激發創造力的事物, 如剛剛上頭提及的研究: Merton 提及偶然的微觀環境、Burt 和 Collins 的特定類型的網絡, 和 Evans 等人的科學研究團隊的量體大小。

第二步, 去理解如何有效利用這些因素來達成自身的目的。當你為了上述研究進行操作時, 結果如下。你能夠, 例如成為偶然的微觀環境其中一份子, 加入新創網絡, 或實際參與看起來較為可靠的團隊。希望在付諸實行的同時, 你的意識與潛意識將能夠創造性地運作起來。

但是, 分別單獨施行這些方法也是有可能激發創造力的, 如 Burt 提及跨越兩個分立網絡的中間人, 其實有非常多方式能夠去進行, 如探究在自身以外的團體或學科中人們的想法, 並希冀這些想法與自己的想法時能碰撞出一些火花。

唯一能夠肯定的是, 當你試圖激發出創造力時, 永遠無法保證結果成功與否。不過, 當遇到必須理論化之時, 你必須致力於提供嶄新與具創造性的事物。常言之, 「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

來信寄至:

Richard Swedberg

<rs328@cornell.edu>

> 理論化的方法： 召喚多元主義

Mikael Carlehed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丹麥



社會學家是坐在三腳凳上的科學家。那三支腳分別是質性研究、量化研究和社會理論。如果其中一支腳狀況不佳，凳子就可能斷裂，社會學家就會摔倒。

來源：Charles Deluvio, Unsplash。

我們該如何理解理論性工作與經驗性工作之間的關係？社會學家幾乎以高度成問題的方式談論這個課題。諸如「一個極深的裂縫」(Parsons)、「分離」(Blumer)、「極具破壞性的分裂」(Joas 與 Knöbl)等都是常見的宣稱。試圖理解這段關係的歷史和社會學這一學科本身的歷史一樣久遠。這些提議已隨著支配性的方法論信念的改變而改變。從這段歷史來看，一種多元主義取徑看起來是合理的。因此，一個可能的出發點是：社會學家是一個坐在有三條腿的凳子上的科學家，這三條腿分別是：質化研究、量化研究以及社會理論。但凡其中一條腿走形了，凳子便將破裂，而社會學家也將就此摔倒。

這些「腿」指涉的是社會學從內部所分化出來的三個主要的子領域，而凳子作為整體則意味著上述三個子領域之間的相互依存性。三個子領域所發展出來的不同的技術和知識其實對彼此都有好處。在不失去差異化和專業化所帶來的效益的情況下去整合這些技術和知識的需要，正在「混合方法」的名義下被討論。然而，這些討論僅僅聚焦在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之間的關係問題。第三條腿呢？我們是否應該把它加入到混合方法的取徑上，以便分析三重關係而非僅僅是雙重關係？在這篇文章中，我將建議另一條可行的道路。

> 我們都在進行理論化

我的建議奠基於如下觀察：今天大多數社會學家都宣稱自己在這種或那種意義下進行理論化。理論化看起來直接地包含在前兩個子領域當中，而社會理論則只是間接地與實證研究相關。此外，前兩個子領域的理論化幾乎不是——至少不是主要地——在

>>

第三次領域的意義下應用和測試社會理論。相反，這三個子領域似乎都包含著不同的理論化實踐。如果我所言正確，回應我開篇提出的問題的所有嘗試必須把理論性工作和經驗性工作之間的多重關係納入考量。並且，理論化應該被理解為差異的、需要被整合的，如果沒有整合，差異化帶來的效益也將喪失。

> 缺失的理論化方法

這個建議意味著我們不應該只是談論經驗方法，也該談談理論方法。我們的第一步首先是把量變分析、詮釋性分析和社會理論區分開來。無論如何，每當社會學家宣稱他們正在進行理論化時，他們所謂之事以及他們的理論化究竟是如何進行卻常常是模糊不清的。相對於經驗方法，社會學家對理論化工藝和技術的反思出奇地少——甚至在社會理論的子領域中也是如此。我們很少或幾乎看不到關於理論性方法的教科書、課程、期刊、方法環節或者研究網絡。因此，理論實踐關乎的是「知道如何」(knowing how) 而不是「知道那啥」(knowing that) (Ryle)。所以，為了避免方法論和理論上的帝國主義，並發展理論化的多元實踐，我們需要對這些實踐進行澄清，也就是澄清理論化的方法。

基於對 Gabriel Abend 所區分的理論的七種含義的重建和開展，我在即將出版的一篇文章¹中提出與社會學三個子領域相關的七個理論化方法，陳列如下：

- 量化研究 (量變分析) :
T¹ 對事實和變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經驗性概括。
T² 建構中等水平變量之間因果關係的假說。
- 質化研究 (詮釋性分析) :
T³ 詮釋：依賴於 (嚴密而厚實) 的脈絡來概念化意義的建構。
- 社會理論 :
T⁴ 社會理論訓誥學。
T⁵ 社會本體論：概念化社會關係的基本特性。
T⁶ 社會批判：社會規範和實踐的建構、重構及解構。
T⁷ 關於社會的理論：對社會構成原則及其隨時間的改變 (宏觀層面) 的概念化。

> 觀察抑或扶手椅取徑

上述理論化方法的區分是基於兩個參數：一方面是理論化和觀察 (如：問卷調查、訪談、田野研究和實驗) 之間的關係種類，另一方面是理論化的主題。在前三種情況下，理論化直接地涉及了經驗研究，但這

點並沒有以任何直接的方式使它們擺脫將經驗工作與理論工作聯繫起來的問題。所有理論化的方法都必須考慮到理論是「由證據決定的」。把前三種方法和後四種方法區別開的其實是：社會理論化研究所面臨的問題無法透過經驗研究得到解決。這些問題恰恰需要「扶手椅社會學」。

無論如何，必須強調的是上述所列的方法應該被理解為純粹類型 (pure types)。理論性工作往往是藉著其中幾種類型的結合而組成的。比如，假設-演繹性的方法 (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 就可被理解為 T¹ 和 T² 的結合。T⁵、T⁶ 和 T⁷ 意義底下的社會理論化往往以 T⁴ 為出發點。量變分析需要詮釋性分析來進行操作，而詮釋性分析需要量變分析來評估其結果的一般相關性。此外，這兩種分析都需借助 T⁷ 來辨識結構性原則對其研究對象的影響、T⁵ 來反思其本體論的出發點以及 T⁶ 來考慮事實的價值負重 (value-ladenness of facts)。相反地，社會理論化需要經驗研究的結果來避免純粹社會理論的空泛。無論如何，社會學向子領域的分化意味著在某些特定的研究計劃中只能運用某些理論化方法。大多數情況下，只有一或兩個方法被系統性地追求，而其它則僅從屬於其中，具有臨時性地位 (ad hoc status) 並被常識性理論化默默地取代。專業化對熟練的理論化很重要，但同時也顯示了子領域之間合作的重要性。

> 召喚理論多元主義

作為結論，我的提議是：在連接理論性工作與經驗性工作時，我們應該以理論化的多元方法之概念為出發點。這意味著社會學的理論化既非僅僅將社會理論應用在經驗研究並加以測試，亦非以量變分析或詮釋性分析來取代社會理論。在社會學的歷史中這些誤解是非常常見的。如今，有許多跡象表明以量變分析為主導的社會學之復興。我們可能將面對1940及1950年代未曾預見過的社會學的「科學化」。正是這一跡象使我發出理論多元主義的呼召。如果我們無法對我們社會學家所坐的凳子的三條腿都照顧得當，我們將就此摔倒。■

來信寄至：

Mikael Carleheden

<mc@soc.ku.dk>

1. Carleheden, M. (forthcoming) "Unchain the beast! Pluralizing the method of theorizing" in Fabian Anicker and André Armbruster (eds.) *Die Praxis soziologischer Theoriebildung*. Springer. —作者原註

> 一起從事自由奔放的社會學！

Anna Engstam, Lund University, 瑞典



節錄自 Katherine Craster (1841-1874) 的作品《The Centipede's Dilemma》: The Centipede was happy quite, / Until a Toad in fun / Said, "Pray, which leg goes after which?" / And worked her mind to such a pitch, / She lay distracted in a ditch / Considering how to run. 來源: Zach Lezniewicz, Unplash。

“如 果我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那就不能稱為研究了，不是嗎？”這句名言出自愛因斯坦，一個毋庸置疑的天才型人物。這句話指出了直覺的不可或缺性：不必一直質疑自己究竟在做什麼地往前邁進；向無紀律的、非正式的思維開放；要相信自己具備無需明證的理性思考以及決策就能獲得有意思的東西的能力。仔細想想，其實你不能通過批判性思維來想出一些新穎的東西，不是嗎？原創性的洞見與想法需要透過創造性思維來產生，不僅如此：你必須超越正常的創造力！你必須像天才一樣地思考！

Robert K. Merton 會是第一個反對上述說法的人嗎？Richard Swedberg 曾指出，莫頓可能是「第一位將理論化作為一種知識、學習及教學的特定領域獨立出來的社會學家。」「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是一

件好事。」他常常這樣告訴自己的學生。透過這樣的方式莫頓強調了有意識地決定如何進行理論化的重要性。Swedberg 發現這很有幫助：「它引發人們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即當你理論化時，你需要仔細關注一些通常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問題。」另一方面「不以線性和邏輯的方式發生的理論化洞察力」很難與 [Merton](#) 紀律性研究的觀念相符合。

要提出「好的問題，即一些關於社會世界的古怪的、不尋常的、預期之外並且新奇的現象，」以及「一個回應、解釋或者解決這些問題的聰明想法」當然是好的社會學理論化的要旨([Andrew Abbott](#))。然而到何種程度我們可以說將發明的過程理智化是一件好的事情？我們關於「如何」的知識(knowledge-how)是否可以透過關於「存在」的知識(knowledge-that)得到促進？無疑地，此一關於理智主義或反理智主義的問題就是我們把理論化進行理論化時將面臨的核心問題。至於愛因斯坦，他告誡人們不要過度地分析(參1929年由 George Sylvester Viereck 進行的[訪談](#))：「也許你能想起蟾蜍與蜈蚣的故事？」(如果不能，那你就該讀一讀 Katherine Craster 1971年的[情詩](#))「我們的心理和情感過程很可能以類似的方式被分析所麻痺。」這個教訓告訴我們仔細思考自己在幹什麼有可能帶來破壞性的影響，從而導致性能受損。在 Charles Sanders Peirce 1907年的[迷人故事](#)中，他透過直覺的猜測追回了被偷竊的物品可以以類似的方式得到理解。很明確：相信自己能夠猜中事情的能力！而這也正是愛因斯坦所做的。

當被問及「關於科學領域的突然飛躍之解釋」時，愛因斯坦把自己的研究發現歸因於直覺和靈感：「我有時覺得自己是對的，而並非知道我是對的。」他為藝術和科學之間的鴻溝搭起了橋梁這事也算是夠有意思的了：「我就像一個合格的藝術家能夠把想像的事物自由地繪畫出來。」上面提到過的Peirce也是如此：科學家必須承認「探究的藝術」，即假設之構想的創造性層面，此一層面反映出了所謂溯因推理的下意識(非-必要)層面。你不該急於下結論，而應該問「如果...會怎樣？」！善用你的直覺！利用你的想像力！如此一來我們知道天才和研究之間有何關係了。接下來我還會給你一個孔恩式的答案。

>>

孔恩在其晚年以自己的方式反思了物理學的理論性斷裂：「我在可移動的範疇上是一個康德主義者，」他說。讓我進一步說明：孔恩是一個區別模糊的康德主義者，一個認識到了天賦在美術領域之外的重要性的康德主義者——一個被尼采所觸動的康德主義者？無論我是對是錯，我把1962年的《科學革命的結構》讀作一次開創性的拼湊：為了弄明白科學史上承諾的非凡轉變（正如研究活動的歷史記錄所顯示的那樣），孔恩借鑒了康德在1790年的《判斷力批判》中關於天才和藝術的說法。在這本巨著的第46至50節，康德告訴我們天才是如何造成的；不僅如此，他強調了作為思考和創作風格的獨創性。我是如此理解的：透過非紀律的創造力，一個天才產生了紀律性的藝術作品——一個典範（孔恩）；更具體地說，一個天才透過將多樣的直覺型塑成一個作品——這個作品刺激了迄今為止在其他人或「作家」中都無法交流的想法——超越了既有的概念。簡言之，一個天才將非形式的思想轉化成一種形式，並且作為未來的孩童，透過共鳴影響著其他的人。

從這個視角來看，天才以思想先鋒（Vordenker）的形象被召喚，當嚴重的異常現象讓你感到尷尬時，他會為你打破僵局；他的構想將為藝術、科學以及兩者之間的一切事物賦予生氣。快樂的科學！孔恩沒有忽視科學社群，然而（1962：122）：「在舊典範下所累積的經驗（無論是不規則的還是一致的）中」，也就是說，在一般科學從事中，透過「直覺的閃現」，一個新的典範誕生了。但如果你過度有紀律從而推遲了詮釋或解釋，那麼「能夠『淹沒』曾經模糊的謎題的『直覺的閃現』（這使謎題的組成因素可以透過新的方式被看到從而首次得到解決）」可能就會被阻隔或忽視。這就是為何我們這些研究員，不能將傳統當作一個紀律性的母體（孔恩）的主要原因。如何不？即承認「社會理論的藝術」（Swedberg）！並且成為一個合格的藝術家！重點是，即使你不是天才，也可以像天才那樣地思考！天才關乎的是你想什麼，而非你怎麼想。且除非你透過直覺創造出什麼東西——即將非形式的想法轉化為形式——否則很難說你有什麼發現。一個馬虎的預研究（Swedberg）可能也是個好的開始！不要那麼快開始嚴格的苦思！

孔恩本人例示了快樂的科學（gai saber）。不僅為了好玩，我們可以把《結構》一書想像成一部古希臘劇：hubris（傲慢，對科學哲學的質疑）、peripety（運轉，即促使他進行澄清的那些批評）、catharsis（淨化，即「對我的批評的反思」以及其它後記）。他做了什麼來開始這一切？透過前折（preflected）。

有時候彎折（flex）你的思考方式是一件好事。而那需要的正是前折性（preflexivity）！

藝術	科學
玩耍的態度	有條不紊的態度
獨創性	紀律性
直覺	理性
非正式思考	正式思考
下意識地	有邏輯地
虛偽地	批判地
粗心	細心
不適當的	嚴謹的
自由奔放	目標導向
發散	收斂
前折性	反身性

在這篇文章中，我嘗試給予你們前折性這個觀念：是我正在型塑的一個概念。所謂前折性究竟意味著什麼，並且這個笨拙的新穎概念能有何用？一個連字號可以帶來完全不同的效果，笨拙的詞彙藉此變成了難以辨認的概念：前-折曲性（pre-flexivity）。如果你知道 prefix（字首）是什麼，你肯定對 pre- 感到一點不陌生。而其中的 flex（折曲），是個與由拉丁語動詞 flectere（使彎曲）構成的詞素 flex-（彎曲）。據此，前折性意味著彎曲以前（before flexion），換句話說，在彎曲的行為或彎曲的狀態之前。我想提出前折性作為反身性（reflexive）的相對概念，我也據此把前者構想為對一種重新彎曲的動作的描述。因此，前折性（與反身性一起）可以被理解為順其自然——更具體地說，是沿著指示的路徑繼續前進的常態——的相反。從一個孔恩式的視野來看，這就等同於以思想先驅（Vordenker）解決類似問題的方式來嘗試解決一個已經提出過的問題，也就是說，無需以創造性的方式提出「回應、詮釋或解決真正的問題的聰明的想法」。我的觀點是，孔恩書寫了前折性而沒有對這一現象進行命名。前折性與反身性的區別可以在他對直觀與詮釋所作的區分的亮光下得到澄清：與反思性思維相比，前折性思維依賴直覺到一個地步可能發生突然的、非結構化的格式塔轉換之類的事情。據此，前折性是孔恩科學理論和科學突破的中心。■

來信寄至：
Anna Engstam
<anna_helena.engstam@soc.lu.se>

> 大理論之後：哲學何以田野？

Nora Hämäläinen, University of Helsinki, 以及 Turo-Kimmo Lehtonen, Tampere University, 芬蘭



來源: Neel, Unsplash

眾所皆知的是，近幾十年以來，「社會理論」發生了一些值得關注的變化。然而，對於到底發生了什麼、如何看待這樣的情況，人們的見解不盡相同。

> 從世紀中的「大理論」到世紀末的「研究」

崇尚「理論」的人們認為，如今的社會科學充滿了無數的經驗研究，卻不再試圖找到關於社會的普遍理論，也不再能為研究提供有效的新方法或觀點。這樣的情況和二戰後的那幾十年間，創造力日益卓越的社會理論領域，形成了鮮明對比。當時學術領域中縈繞著激辯的氛圍，不同思想流派一個接一個建立、且經常彼此對立。各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對於美國社會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帶來了重大挑戰；魯曼和哈伯馬斯針對傳播／系統理論有來有往地提出了深具影響力的不同論點；諸如紀登斯和布爾迪厄等思想家，則為了跳脫「行動者」與「結構」的極端並強調「實踐」的效應，開創了新的研究議程；大量的哲學辯題也在歐洲社會

學中受到關注，例如 Jean-Francois Lyotard 或 Jean Baudrillard 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著作，還有傅柯的研究中談到的，權力與知識如何參與於西方主體性的歷史形塑過程中。

1980年代末至90年代間，一個重大轉向出現了——「研究」當中的各個跨領域學科受到了重視，如：文化研究、城市研究、性別研究、後殖民研究、科技研究，以及最近的酷兒研究和棄兒研究等等。這些研究以嶄新的方式，大量地使用過去前幾十年間出現的理論概念。社會學研究與人類學、哲學、歷史和文學交織，而其研究目的不再是找到能廣泛解釋世界的框架，而是以經驗性為主，並且使用了多元的方法及理論。社會學的多元性，對於經驗研究發掘新概念來說是很有幫助的。這些經驗研究也逐漸將焦點置於空間性、時間性、體現、物質性、照護實踐、知識不正義等主題。

然而，上述性質與大社會理論的目標相去甚遠。至少在目前，即便新一代社會學雄心勃勃地試圖發掘新的概念及理論，其對於當代想像的掌握仍不如預想。在社會學系中，多數研究都離不開孔恩學派所說的那種「正常科學」(normal science) 框架；其方法和主題相對成熟，且有許多據正當性的概念化路徑可供選擇。社會學的整個學科，似乎對於藉著理論研究高調地復甦已經沒有期待，而理論研究及其目的，已經成為了某種邊緣化的消遣方式了。

> 生活實踐的理論效力

那麼，社會理論如今已走到終點了嗎？我們認為不是的。我們怨聲歎氣，並非是因為如今的理論研究不再與過去相同，而是希望能提醒各位：在社會學研究與各類領域交織之時，理論思維仍然健在。我們將這種游移於各種知識遺緒之間的學術形式，稱為「哲學的田野工作」。

這個詞是由哲學家 J. L. Austin 所提出，他強調我們需要藉由熟悉普通語言，來克服哲學的泛化問題。後來，布爾迪厄借用了這個概念——他認為，這個概念對於如何將哲學變成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來

>>

說，是很有幫助的。另外，Paul Rabinow 則以更貼近我們的脈絡使用這個概念：他發現，若要有效地處理當代現實的複雜性，借鑑於哲學理論方法中的提問方式會是很好的辦法。

那些符合「哲學的田野工作」這個標籤的思想家具有一個共同點，即是他們關注生活實踐（語言的、制度的等等）的方式，是具有理論效力的。他們並非只是把一個「巨大的」的解釋理論，套用於他們所研究的世界，而是傾向從社會現實出發，來找到理解世界的方式。這可以說是一種由下而上的研究形式，且以產生具有理論意義的結果為目標。

> 廣泛領域的重要特徵

從「哲學的田野工作」這個詞彙，可以看出哲學和人類學實踐之間的深厚連結。在我們看來，這個概念也很好地捕捉到了當今許多社會學研究的基調。在現在許多出版物的參考文獻列表中，我們看不到有關於「巨觀」理論的作品，而是會看到那些以經驗材料和歷史資料為根基的哲學研究。我指的是像 Michel Foucault、Bruno Latour、Ian Hacking、Donna Haraway、Annemarie Mol 這些哲學家，以及一些人類學家如 Anna Tsing、Marilyn Strathern、Eduardo Kohn、Tim Ingold 等等；對於那些遊走於各個領域與傳統質性研究邊界的社會學家來說，他們的著作有著特別大的影響力。我們認為，廣義的「哲學的田野工作」有四個重要特徵。

1. 注意到特定場合中的人類生活和活動，具有特定的時空限制，而不是將一切情境都預設為具普遍性的。舉例而言，就如 Hacking 在《The Taming of Chance》中所述，在一些制度化的環境中，人們可能會重新鞏固現代社會對於「機率」的認知。
2. 具有理論敏感度——關注針對特定場景中發生什麼的描述，並確信這些描述具有理論和哲學意義；一個例子是 Mol(2003)便宣稱自己在荷蘭一所大學醫院中進行的人類學研究是與「經驗哲學」有關的。
3. 與概念化的學術工作有關——包括被研究的場景中，人們所使用的概念，以及為了描述場景中發生的事情而發展出的概念。如傅柯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不只指出什麼樣的論述以及其中的「成員分類」

概念，在19世紀法國監獄、醫院、學校、軍隊中出現的新主體形式中如何發揮作用，更開發出新的概念工具以呈現他的分析，例如「權力的微觀物理學」。這些概念扎根於特定的、被描述的場景，完全不是為了「大理論」而生，但卻在如今被跨學科、領域的學者們應用於各種不同的研究中。

4. 最後，許多（雖然不是所有）與具有此一特性的研究，都涉及了本體論的問題——現實究竟如何構成？拉圖的《Aramis》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深入研究特定科技興衰的過程中，他透過具體的經驗描述，成功解決了涉及人類團結和集體本質的本體論問題。

相較於由上而下地將理論「應用」於後續研究並為理論本身留下足跡，具有「哲學的田野工作」特性的研究，則是為特定觀察和使用概念工具的方式留下了紀錄。若是人們認為這些工具和觀點，在實際應用中也是有效的，那麼他們就可以在新的研究場域中運用，並根據其需求修改這些方法。像傅柯、拉圖和 Mol 這類學者具有理論敏感度的著作，提醒了那些新興研究者——面對新的研究對象和問題，儘管去開展出合適且創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吧！總而言之，如今的理論並沒有被侷限在「社會理論」的範疇內，而是在實際進行研究的過程中，迎來了新的發展和轉變。■

來信寄至：

Nora Hämäläinen

<nora.hamalainen@helsinki.fi>

Turo-Kimmo Lehtonen

<turo-kimmo.lehtonen@tuni.fi>

> 理論與實踐之終

Arthur Bueno, University of Passau 與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德國

來源: Boys in Bristol
Photography, Pexels



當代社會學中最具影響力的許多思想，都是以實踐的概念為核心(Schatzki等人, 2000)。可以確定的是，這些思想潮流的新穎之處，並不是這個概念本身有多創新，因為早在二十世紀中期，實踐的概念於社會學中已經有很重要的地位——其在能動性與結構的長期論戰中極為關鍵，也促使馬克思主義中「praxis」一詞的意涵發生了轉變。簡單來說，布爾迪厄與紀登斯等理論家不再試圖深究無產階級到底應該採取何種革命形式，反而是從一種於政治上更溫和，但也更深遠的角度來理解「實踐」。雖然此一概念仍處於社會再生產與社會轉型的交叉路口，但「實踐」更關注的，是持續、日常的社會結構如何經歷內在與外在化，而不再與推翻資本主義有必然的連結。

然而，新一代社會學家認為這種理解實踐的方法過於狹隘。他們認為，將人的行動解釋成是無意間使得社會結構被實現，可能會邊緣化人的能動性、將個人的視野呈現得「過度整合」(Archer, 1982)、個體於是便成為了「文化的笨蛋」(Boltanski, 2011)。此觀點的認識論並不合理，因為社會學家的任務，便是向身處於特定時空中的人，揭示他們無法察覺的結構性因素。像拉圖和 Boltanski 等學者與這些觀點持相反立場，他們強調非人具有能動性、人類具有反身性，並指出人應該與這些非人之物學習、對話，而不是等待外部環境或佔據支配地位的事物來啟蒙自己——藉此，這些學者便從根本上質疑了結構的概念。人們曾經認為「社會」或「資本主義」這類結構性

的範疇，能夠協助我們解釋實踐背後的邏輯，但是這項願望並未實現：它們最終只是忽視了行動者們如何在不同情境間，與其他行動者積極地相互作用。

> 實踐的悖論

新一波的社會學藉由拋棄過去對實踐的理解，提出了一種由下而上的、全新的政治概念。這項行動可以說，是為了推動民主化的進程。說真的，誰能批評這些方法沒有比過去更重視行動者呢？誰又能反對這樣的政治，認為承認行動者的主動性和反身性，或者平衡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之間的權力關係，是不好的呢？

然而，轉向關注行動者，有時也會使我們更加擔憂。1980年代以來，特別是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人們對於民主品質似乎有越來越多的不滿。在近期 Chancel 和 Piketty 發表的文章中，他們對如今權力與財富集中程度高漲的現象發表看法，認為「21世紀初新殖民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平等，與20世紀初的殖民資本主義可有得比！」此外，即便氣候變遷嚴重，且人們對氣候問題的原因早就取得共識，但是每次國際峰會都還是將解決方案一再推遲。如果這些問題確實存在，我們似乎不能再把問題歸到「缺乏反身性」頭上了。

於是，實踐這個範疇，似乎落入了某種悖論中。當我們越強調能動性和行動者的反身性，似乎就越感覺我們的訴求在這個世界中被置若罔聞，而我們越試圖

轉變這樣的處境，就越感到不安（每一代社會學家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中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這樣的情況縱然不是我們這些只能在學術領域中努力的社會理論家所造成，但還是促使我們重新省思這套實踐概念的政治意義。我們如何不認為，我們正面對著強大的制度或結構呢？我們如何能否認這些由我們自身的能動性所建立的現實（制度、結構等），有著我們難以觸及、甚至影響的規律？誰又能反身性地，要求更多相同的事物呢？

> 事物的邏輯

兜兜轉轉，我們似乎又得將視野放回社會結構上，著眼於結構明顯有著的某種自主性、隱晦的運作機制，以及人們無意識的動機。然而，僅僅在理論上重申行動者與結構之間的對立、主張支持其中一方而排斥另一方，是錯誤的；因為這兩者間的對立，並不僅是關於「邏輯的事物」，而涉及了「事物的邏輯」。行動者與結構之間一直存在的裂隙，並非是認識論錯誤所形成，而是社會現實本身運作的結果——這正是我們能夠同時接受前述兩種觀點的原因。我們擁有主動性、反身性、動態性與多樣性的能力，並且有著使用這些能力的慾望。奇妙的是，與此同時，我們面對著一個，與我們所擁有的能力站在對立面，且異化於我們的世界。很矛盾地，正是因為我們不斷被要求應該主動創造自己的歷史，才變得無法實現這點。我們的行動使我們變得被動；我們既是反身的，也是遲鈍的。

馬克思將這種奇特的邏輯稱為「拜物教」（fetishism），Lukács 則稱之為「物化」（reification）。那麼，我們是否應該更進一步地回到過去，重新拾起他們版本的實踐概念？我認為答案是：是的，但可能不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不管如何，最重要的是要保留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實踐本質上所具有的、「需要被實現」的意涵。實踐這個概念，不只是關於社會結構的內化與外化，也不只是關於人如何先天便具有能動性；而是應該將能動性理解為某種潛在的能力，只是其在現下環境中，受到特定條件的限制。這就是為什麼行動者與結構之間的二元對立，沒有辦法藉由在理論上放棄其中一者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於現實中處理，在「事物的邏輯」中實現。在這裡，實踐與抗爭、集體轉變和解放是同義詞。行動者和結構間的中介不是一個空殼詞彙，而是一種需要在政治上實現的事情。

> 被動性與權力

採用此觀點，並不代表我們就要完全放棄近期實踐社會學的關注，只是換了一種理解方式。確實，如果我們無法認知到行動者具有積極、主動的能力，就可能在面對無可避免地佔據上風的「系統」時，率先剝奪

了自己的權力。正如拉圖曾經在談論資本主義時所言：「如果你一直失敗並且不做出改變，這並不意味著你面對著一個不可戰勝的怪物，而是意味著你喜歡、你享受，你喜愛被這個怪物打敗。」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制度性因素某種程度上促使我們變得與笨蛋更接近一點，因為這也會導致同樣的狀況發生。如果每次面臨制度的阻礙時，我們都能告訴自己：我仍然存在著、行動著、抵抗並實踐著，那麼這些結構就會變得更脆弱，變得越來越缺乏政治力量——反之，我們訴求的越少，得到的也會越少，而再下次提出訴求的效果也就越差。

無論是否預設有一個全能的系統存在，我們最終都會陷入無力與失敗的處境當中。問題從來就不在於結構或能動性本身，而在於我們誤將它們視為靜態的實體：前者是既存、且永遠存在的，後者則微不足道。而實踐的概念能給予我們的，正是承認、表達此對立，並為其帶來轉變。

我曾經說過，對解放運動而言特別關鍵的，是意識到即便人的行動與能動是存在的，我們仍受制於超出個體掌握的結構邏輯——不預設人的能動性，並接受自己是被動地成為「機器中的齒輪」。但我們不能止步於此。我們需要抱持著積極的態度，承認個人身體在結構邏輯面前有其脆弱之處，然而這正巧凸顯了個人身體擁有的物質力量——沒有這些力量，結構也無法存續。以馬克思的話來說：「以（資本的）系統化支配為基礎的，是人和非人生命的生存（勞動）力量。」一旦這樣的力量受到肯認，並且自發地組織起來，就可以對抗既有結構、為新的結構賦能。能動性於此重新顯現——其不再以單一行動者行為的形式出現，而是成為了一種，一同處於脆弱狀態的集體之生命力量展現。只有在意識到自己的被動性時，我們才能行動起來。實踐之所以成為目標（becomes an end），正是因為我們承認它有終止（end）的可能。■

參考文獻：

- Archer, M. (1982) "Morphogenesis Versus Structuration: On Combining Structure and A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3(4): 455-83.
- Boltanski, L. (2011) *On Critique: A Sociology of Emancip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Schatzki, T.R., Knorr Cetina, K., von Savigny, E. (eds.) (2000)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來信寄至：

Arthur Bueno

<arthur.bueno@uni-passau.de>

/Twitter: [@art_bueno](https://twitter.com/art_bueno)

> 實踐反殖民社會理論

Sujata Patel, 退休教授, University of Hyderabad, 印度, 2021年 Kersten Hesselgren 訪問教授, Umea University, 瑞典

反殖民社會理論從反殖民思想的批判性理解中取經, 這種思想通過反殖民社會運動在全世界發展和傳播。反殖民思想在不同的面向上評估了殖民地上的階級制度和宰制／霸權的建構, 也因此是對「在地」群體在抵抗殖民主義的角色和干預上的原—社會學分析。為了做到這一點, 反殖民思想定義了一種方法, 以駁斥在殖民地內使殖民統治落地生根的既定觀念、原則和假定, 並釐清這種宰制／霸權知識在殖民國家發展方式的歷史脈絡。此外, 它假定殖民主義是一個歷史分水嶺, 是資本主義剝削人民、地區和領土的標誌, 因此它開啟了尋找新的認識論來理解殖民／帝國主義所定義的當代現代性。

基於反殖民思想的社會理論發展是一個晚近的現象, 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 社會科學把關於殖民／帝國主義以及其與現代性間關係的討論推到了邊緣。然而, 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來, 隨著「社會學理論(們)」的標籤開始越來越多地被另一個標籤—「社會理論」所取代, 其與反殖民社會理論連結的觀點已經出現了。這種變化是社會學在19世紀末的實證主義觀點瓦解之後發生的, 這種觀點評估規律性, 進行類似法律的分析, 並使用回歸基礎的變數模型來理解「社會」。同時一些學者採用詮釋學或詮釋和結構主義的分析, 而另一些學者則建議需要釐清該學科的歷史脈絡, 以理解社會學經典和名著在解釋歐洲內部或外部構成的新現代性方面上是否相關?

> 以原有的本體論和方法論來取代霸權主義的邏輯和思維

因此, 社會理論可以被看作是一種以社會學為基礎的, 對原—理論, 或在此之上的哲學反思, 以探索其本體—認識論的停泊處。社會理論的這種闡述也導致了社會學內部對「規範性」的接受(Chernilo 和 Raza)。我認為, 反殖民社會理論是這些規範性趨勢中的一種, 它對於知識、其領域以及其與資本主義和殖民／帝國主義停泊處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拷問。它是一種方法論上的介入, 駁斥了宰制／霸權形式的邏輯和思維的使用; 同時尋找一種原始的本體論,

以創新的理解方式去認識和思考。因為它將宰制／霸權思想, 與資本殖民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剝削和排除過程給連結起來; 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社會科學方法, 它是一種將知識建構過程的政治學理解, 所理論化而非僅僅是闡述它的方法論。因此, 它從社會學的角度去審視經驗的、理論的以及組織各領域／學科的「科學無意識」, 以提出一個新的選擇(Rutzou)。

有鑒於殖民主義從十六世紀開始在各地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導致了反殖民主義的政治鬥爭在許多不同的空間和地點發揚光大, 原—社會學的反殖民主義思想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而反殖民社會理論抑是。這些不同的方法論立場是: 原住民社會學、原民性和原住民方法論(Atal; Akiwowo; Smith)、內生性和內生性思想、外向性(Hountondji)、自主和獨立社會學(Alatas)、底層理論、衍生性國族主義和殖民差異(Guha; Chatterjee)、殖民現代性(Barlow; Patel)、內部殖民主義(Martin)、權力的殖民性(Quijano)、邊界思維和脫鉤(Mignolo)、南方理論(Connell; de Souza Santos)、連結社會學(Bhambra)、以及後殖民社會學(Go)。毫無疑問, 這些不同的立場有其獨特的屬性, 但也標明了它們的最小公分母乃是當務之急。我認為這個最小公分母, 這些方法作為一個本體—認識論視角, 都隸屬於反殖民社會理論。

> 接下來呢?

反殖民社會理論不僅為解構不同地域的宰制／霸權地位提出了方法論, 還由知識的全球分工脈絡出發, 以新穎的方式制定了重構這些地域的步驟。它是一種戰略, 為解構知識流通和再生產的制度化流動提供了方法。它的討論有助於重新框架全球社會理論的碎片化領域, 並主張這些差異並不代表該領域的封閉。相反地, 上述觀點及其各種代表都肯定了一種方法論假定, 「社會」的知識在意識型態上與殖民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相關, 並表達了作為宰制／霸權觀點在殖民時空下的脈絡。他們認為, 當代社會科學理論需要透過對於知識生產的政治理論進行調

「反殖民社會理論以知識的全球分工脈絡，為解構宰制／霸權地位提出了新穎的方法。」

節和篩選，而後理解殖民／帝國的地緣政治則是評估知識生產和現代性政治理論的先決條件。

對歐洲中心主義的當代批判是建立一個反殖民觀點的本體論起點。這意味著，第一，承認由「我」和「他者」所組成的，在歐洲中心主義二元結構中的權力公式。反殖民主義的學術研究點出了顛覆這一點的方法，並找到一個新認識論的聲音來定義「我」。這促使學者們設計新的方法來研究權力／知識政治學：Paulin Hountondji 的內生性，Ranajit Guha 的結構主義式檔案解構，以及 Aníbal Quijano 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這種研究也導致了對於，殖民權力如何影響殖民地階級制度的建構，所進行的分析。這可以從 Guha 對國族主義精英和中產階級的區分，以及 Quijano 對於剝削是以階級和種族來組織的此一理解上看以看出。第二，這些觀點為時間／歷史的線性理論以及其進化主義理論進行辯護使其免於改變。隨著殖民主義的出現，人們認為認識論上的斷裂出現了，歷史需要從這裡開始。因此，大多數在殖民地地區發表的反殖民現代性理論都對殖民／帝國的空間連結進行評估，這些連結組織了商品、想法、意識形態和知識領域在世界的大都市、半邊陸地區和邊陸地區之間的流動。

> 審視歐洲中心主義的屬性

更特別的是，當代反殖民社會理論綜合運用了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依賴理論的解構、世界體系分析以及批判性馬克思主義歷史社會學等方法論上的策略，對歐洲中心主義的特質進行審視。因此，它以各種方式論證了宰制／霸權的社會科學(a)是國

族中心主義的，因為它們投射了歐洲現代性經驗的優越感；(b)使歐洲現代性的歷史和文化模式成為普世價值，從而促進了路徑依賴性；(c)有時部分重構，有時抹去非歐洲歷史，透過包括種族、種姓、性別主義和其他範疇的階級制度的二元對立來重現它，(d)在社會科學之間劃分和創造邊界；以及(e)促進以東方主義的方式看待非歐洲世界。

反殖民社會理論肯定了描繪脈絡、時間和空間的必要性，以組織研究問題和方法，去了解是甚麼社會進程、機制和事件，影響了殖民地和殖民世界中的行動和行動者的。這種社會理論有助於研究如何建立關於現代性的務實性理論，確認其相關性，調查經驗性資料，並將它們應用以進行實證研究。作為對社會學的哲學假定調查，反殖民社會理論可以成為當代全球社會學的基礎。■

來信寄至：

Sujata Patel

<patel.sujata09@gmail.com>

> 社會理論經典下的女性

Luna Ribeiro Campos, 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 和 Verônica Toste Daflon, Federal Fluminense University, 巴西



來源:Vitória Gonzalez 創作的影像蒙太奇, 2023。

1838年, Harriet Martineau 正為了創造社會「安全概論」(safe generalizations)的法則進行辯護。在 Émile Durkheim 的《社會學方法論》發表前近六十年, Martineau 發表了《如何觀察道德和禮儀》,這是一部精美作品,對於人際關係的知識生產所進行的認識論挑戰。

Martineau 將社會想像成一個領域,其中制度、物質生活、符號、情感、身體和人口因素交織在一起。像她的前輩 Mary Wollstonecraft 一樣,她認為家庭道德和政治是「在實踐中不可分割的」,科學家只能為了分析的目的將公私領域分開。總而言之, Martineau 是一位認知到社會生活性別基礎的理論家。

在她去世後的幾年裡, Martineau 和其他先驅者,如 Flora Tristan、Anna Julia Cooper、Marianne Weber、Beatrice Potter Webb、Jane Addams、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以及 Alexandra Kollontai, 都變得默默無名。來自英歐背景之外的女性參與19世紀的公共辯論和出版市場也被遺忘,例如印度作家 Pandita Ramabai 和南非作家 Olive Schreiner。

這些女性的發展軌跡非常多元:有些人深入地參與了社會學的建構,而另一些人並不一定在乎創立一門學科,但提出了我們現在理解為社會學的觀

點。儘管存在著差異,這些女性展現了,社會學的歷史不是線性的,而是有多重起源,且比我們通常所認識到的有更多的主題和地理多樣性。

社會學的制度化和陽剛化是相輔相成的。賦予 Karl Marx、Émile Durkheim 和 Max Weber 經典地位的學術和政治爭論,抹殺了女性在社會科學建構中的存在,並使非歐陸的資料來源沉默。因此,許多性別化的調查領域被邊緣化,限制了我們的社會學想像力。正如 Dorothy Smith 所指出的,日常世界是一個向社會學調查開放的問題。因此,那些被忽視的議題,例如家庭、婚姻、性和再生產;不僅僅是私人問題,而是與社會學有關的問題。

> 婦女促成的社會學關鍵議題

由於婦女在古典社會學中的存在從未被系統性地承認,因此描繪她們的貢獻始終是一個挑戰。對她們作品的一無所知、缺乏新的出版和翻譯,以及具有批判性視角的研究,都助長了一種說法;即在19世紀沒有婦女思考社會問題。這種對婦女在社會學歷史和教學中貢獻的漠視,影響了對該學科核心概念、理論和方法的定義。

例如,在19世紀上半葉,秘魯裔法國思想家 Flora Tristan 分析了工人階級婦女在家庭和工作環境中的特殊狀況。可以說,她在對英國工人階級的研究中使用了參與式觀察的方法論,比 Friedrich Engels 的書還要早幾年出版。此外,她了解到壓迫關係不僅建立在法律機制上,而且鑲嵌在日常生活的結構與制度中,例如教堂和家庭。

Pandita Ramabai 則寫了許多作品,其中她記錄了在印度婦女在宗教、種姓、不平等和殖民主義交會下的複雜處境。Ramabai 從理論上闡述了種姓間的親密關係、種姓的內婚形式、日常生活的儀式化、以及對婦女的控制。她指出了種姓與嫁妝、寡婦待遇、甚至殺害女嬰等實踐相關的機制。她的作品揭示了社會群體間的性別化特徵以及劃界。

到十九世紀末,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的作品被廣泛閱讀。Gilman 是美國社會學協會的成

員，她批評了維多利亞時代對母性和女性持家的崇拜。在她的作品中，她努力地釐清家庭和住宅的歷史脈絡，將社會確定為家庭、國家和市場之間緊密的關係網絡，並形成一個高度相互依賴的結構。

至於德國人 Marianne Weber，她寫了九本書和幾十篇論文，其中討論了法律、婚姻、母性、女性自主權和父權宰制等議題。Marianne 以一種類似於歷史社會學方法論的方式比較了不同社會中的有關婚姻的法律協議。為挑戰婚姻中的從屬性，她為伴侶關係的建立和法律改革進行辯護，認為這是保障女性個體性的一種方式。

在同一時期，南非思想家 Olive Schreiner 在有關南非建國可能性的爭論上積極地發聲。她對英國在南非領土上的殖民主義行動抱持批判態度，並譴責帝國主義者發動對礦產資源和原住民的剝削。Schreiner 在國族形成，以及其與民族、領土、種族和性別間的矛盾關係上，展現出銳利的目光。

最後，在二十世紀初，Ercília Nogueira Cobra 透過觀察，性以及婦女身體被控制的方式，提出了對巴西性倫理的批判。Cobra 展示了榮譽準則，例如要求婦女在婚前保持處女身份，是如何與剝奪婦女的公民權利聯繫起來的。因此，她展示了法律制度如何影響社會關係，指出對性的控制可以成為權力關係施展的基礎。

通過認真看待這些婦女的文本，我們試圖對被理解為社會生活基本要素的性別範疇進行分析。我們的想法是要去了解這些由婦女生產的理論是否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諸如秩序、行動和社會變革，以及工作、權力、社會連帶和不平等的概念。

> 思考經典時的當代挑戰

在當代社會學中，對社會學經典的地位存在爭議。像 Raewyn Connell 和 Patricia Hill Collins 這樣的作者就認為，面對日益複雜和全球化的社會學，經典的概念本身並不是永續的。然而，國際社會學群仍為了專業化的目的持續依賴經典作家。

無論我們怎麼想，使新舊經典形成的社會過程依然在進行。有資格被稱為「偉大理論」的東西通常是作為古典社會學二律背反的合題或超越而被提出的。因此，古典和當代理論始終保持著一種基本的關係，這種關係似乎遠遠沒有到此為止的一天。

為了使性別不再是一個次領域甚至是一個自給自足的領域（自嗨同溫層？），並進入社會學的核心，有必要將女性作者納入古典社會學的圈子，使她們成為教科書的引用文獻。近年來，已經採取了很好的行動，比如 Patricia Madoo Lengermann 和 Jill Niebrugge-Brantley、Kate Reed、Mary Jo Deegan 以及 Lynn McDonald 的作品。如果我們繼續在生產帶有女性偏見的歐洲中心主義觀點，這將會是毫無意義的。正如 Alatas 和 Sinha 所提及的那樣，超越經典的社會學理論是需要朝歐洲以外的地方看一看的。

在巴西，我們出版了《社會學先驅：18和19世紀的知識女性》（[Pioneiras da Sociologia: Mulheres intelectuais nos séculos XVIII e XIX](#)）一書，為這場辯論做出了貢獻。該電子書目前只有葡萄牙語版本，彙集了16位來自不同背景的女作家，並建議以教學的形式介紹她們，這在國內是史無前例的。

將這些來自不同地區的女性作家——無論是否為經典——一同納入思考脈絡中，將是歷史與社會學的挑戰。通過比較，可以對來自全球北方的互惠普遍主義理論進行相對化和批判，揭示出獨特的社會歷史配置，同時也為分析標誌著現代世界的全球宏觀社會學進程提供線索。重新思考社會學典籍並使其更具包容性，是等待新一代的任務。■

我們要感謝 Fundação de Amparo à Pesquisa do Estado do Rio de Janeiro 對我們研究項目的支持，以及致力於推動科學知識的發展和培養巴西的學術成就。

來信寄至：

Luna Ribeiro Campos

<lunaribeirocampos@gmail.com>

Verônica Toste Dafl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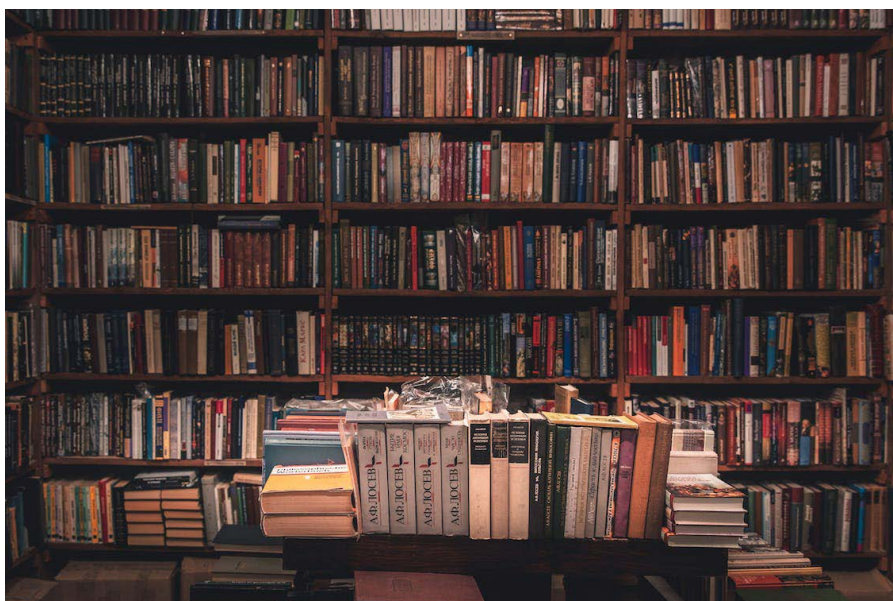
<veronicatoste@gmail.com>

/ Twitter: [@vetoste](#)

> 開放取用、掠奪性期刊或訂閱制期刊

Sujata Patel, 退休教授, University of Hyderabad, 印度, 以及 2021年 Kersten Hesselgren 訪問教授, Umea University, 瑞典

來源: Stanislau Kondratiev, Pexels



最近有位來自歐陸大學的同事向我邀稿, 文章將刊登在其編輯的英語社會學理論開放期刊的專號中。雖然我從未聽過這份期刊, 但我立刻就答應了, 因為這意味著如果文章(在通過審查)發表後, 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潛在讀者, 或許這會有助於克服今日專業知識都由訂閱與付費制期刊所主導的潮流而產生的瓶頸。眾所週知, 訂閱或付費期刊並不受到絕大多數的政府、大學、研究機構或研究基金所補貼, 因此也產生了跨國與全球學術群體在資訊與知識上觸及量能的限制與隔閡。惟上述針對期刊所產生質疑帶領本人發現學術社群是如何看待開放取用; 即我多數的同事認為開放取用制期刊大部分是掠奪性期刊, 訂閱制期刊反而比較專業。令我困惑的是: 當開放取用允諾了免付費的學術發行, 甚至鼓勵學術社群間的交流與對話時, 為什麼我的同事會有這樣的想法?

> 樂觀的開始

開放取用(open access, OA)運動起自1990年代當網路成為通訊的代名詞, 以及重新定義了過往

以印刷物為基礎的出版業, 此一運動爾後也變得愈發重要。2001年, 布達佩斯開放取用宣言(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BOAI)定義了OA作為一個免費及經過同儕審查的學術研究, 「在網路上允許任何使用者閱讀、下載、複製、發佈、印製、搜尋或連結全文, 爬梳參考資料、檔案傳遞, 或用於其他合法用途, 除了與網路途徑本身密不可分的人士外, 沒有任何財務、法律或技術的壁壘」。BOAI也指出所有文章的智慧財產權皆歸作者所有, 這個定義也影響了創用CC授權條款。

當開放取用期刊逐年穩定的增加, 期望能降低每篇文章的出版費用, 如最終將會不再支出印刷及稿費。透過這樣的引導, 期望未來絕大多數的期刊都能成為OA期刊。

> 掠奪索賠

然而, 微風仍吹不皺一池春水。近期的報告評估中, 在2013年仍僅有25%的出版為OA期刊。為何這場運動並沒有捕捉到所有學者對於期刊的想像? 其

>>

中一個假設是多數的 OA 期刊收取處理費，而因此是掠奪性期刊：「只要付錢，任何文章都可以刊登」。

將這種期刊冠上「掠奪性」之名，首先是自由主義學者 Jeffrey Beall 自2010年起就公開抵制 OA，其曾在網路上羅列了一份[掠奪性期刊的清單](#)。對 Beall 來說：「掠奪性出版者利用(作者支付的)金錢辦立開放取用模式，且試圖增加收入，時常忘記了合宜同儕審查的這個前提」。

較新的文獻顯示 Beall 並不是唯一一個抵制 OA 的學者。此外，大型出版商也與學會和其遊說者進行利益交換，試圖提倡 OA 對同儕審查體系來說很危險這個點子。其論點為做出好研究的關鍵基礎是訂閱制期刊，特別是這些由學會、專業協會和研究機構等結盟而體制化的同儕審查體系。儘管意識到其試圖牟取利益的商業模式，他們還是堅持其也與相關機構(如國際社會學學會的預算大部分仰賴出版稅)分享了收入，因此提倡知識生產既是專業且全球性的。此外，其認為自身也保護了作者與研究機構的智慧財產權。

因此，絕大多數的學會和專業學會也都支持大型出版商，反過來說這些出版商強行介入公共領域以確保他們期刊的權利受到保護，且抵制任何形式的開放取用。例如，在2012年一些出版商(Oxford、Cambridge以及Taylor and Francis等等)因為德里大學的影印店販售複印本及散頁而在印度法院提起訴訟，然大學與高等法院同樣支持影印店，訴訟後來也不成立。

> 遠離制度二元分立的需求

掠奪性期刊無疑是存在的。與印度、伊朗相同，擁有最多此類期刊的美國和日本，其學術監察機構和大學並不認可透過在這些期刊發表的文章作為學術績效評估。然而，所有的OA期刊都真的純然是掠奪性期刊嗎？針對 Beall 所羅列期刊名單的[近期研究](#)顯示，其所認為OA期刊裡最主要的缺失，在訂閱制期刊中也看得到，此外也並不是所有的OA期刊都會收取文章處理費。開放取用期刊指南指出目前約有超過18000種以上的OA期刊可在網路上取得，約有13000種並不收取處理費。同一個研究中，作者也提及與其爭論 OA 與訂閱制期刊的二分，更重要的是提出更多值得反思的問題，例如如何建立一個較好的審稿方式，並且將其制度化，以及如何使得這樣的制度在OA與訂閱制期刊中公開透明地落實。另外，同等重要的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區是否也能夠完善地執行。

當然現在需要更多此一相關議題的闡發，我的論點是出版業是知識生態系統的一部分，透過不同語言社群之間知識生產與流通的分歧而能蓬勃發展，而出版業也充實了這個體系，並將之制度化。二戰後，當大學與研究機構在全球北方並橫跨世界蓬勃發展之時，這個生態系統也隨之孕育而生。在這樣的擴張地下，有個觀點認為由全球北方所製造的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知識領域是具有普遍性的，並且值得世界各地的學術社群效法，並加以制度化。

這個生態系統訂下了由歐美大學、研究機構與實驗室肩負知識生產的角色，而知識是透過私營期刊、書籍的出版與發行來進行傳播。很快地，這些大學與研究機構變成這些學術期刊與書籍的主要消費者，從而在他們和私人出版社之間建立了共生關係，也難怪這些在英美的出版商將其產品分類比做國際市場的一部分，而其他地區的知識產品則是照區域排序。近來藉著大學針對教師的表現進行相當嚴格的評鑑，這個生態系統有著顯著的成長，並給予了訂閱制期刊更強大的合法性。開放取用運動顛覆了這個生態系統，因此對所有與它有利害關係的相關人士構成了威脅。

然而，世界各地想要發表或閱讀新興研究的學者將何去何從？同時，世界各地那些旨在鼓勵獨創內容、新穎寫作風格和不同評論的出版品又將如何呢？就如同那些渴求全球對話的學者們，我希望我們可以就這個課題，開啟我們之間的討論。■

來信寄至：

Sujata Patel

<patel.sujata09@gmail.com>

> 為了給印度比哈爾邦更好的尋求健康行為

Aditya Raj 和 Papia Raj,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atna, 印度

來源: Anna Shvets, Pexels



疫情造成的行為改變，成為了社區中控制病毒傳播的規範。政府數度下令封鎖邊境並宣導民眾保持社交距離、自我隔離、居家隔離、在公共空間配戴口罩和手套和勤洗手等習慣。儘管付出了這些努力，印度政府仍無法有效控制疫情；正如大眾媒體的報導，大部分人並沒有遵守政府的規勸，更重要的是，也不願意進行病毒檢測。並且，就算被測出陽性，人們直到情況變嚴峻前，都不願意承認自己已經感染了病毒。由於公共衛生基礎建設的匱乏，比哈爾邦作為一個未開發省份的狀況更為嚴峻。這顯示了社區中個人參與尋求健康行為 (HSB) 的重要性。

HSB 的概念是透過社區中的成員所進行一系列預防和補救的行為以改善被發現的疾病或維持良好

的健康狀態。因此 HSB 構成了人們所做出的「健康選擇」，這些行為因地理上空間和社群的不一而有所不同。為了改善現況，最重要的是了解阻礙人們採取漸進式 HSB 的因素，同樣也須了解人們會因為什麼樣的契機而有意願發展正向的 HSB。儘管 HSB 是公共衛生中重要的一環，目前在印度，特別是在比哈爾邦，仍沒有針對了解阻礙和促進 HSB 因素的研究。

> 從比哈爾邦斷代研究中所吸取的經驗

我們在巴哈爾邦的市區巴特納進行了跨區研究，這個地方擁有全印度最高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我們採用混合研究方法並收集了 2021 年四月到七月這段疫情期間的主要數據。根據我們的數據分析發現，有 43% 的人表示他們曾經確診 Covid-19，34% 的人

>>

表示家中成員有一人或超過一人有確診的經驗，並且23%的人有自己和家人同樣都有確診的狀況。確診的人口有明顯的性別差距：61%的人為男性，其餘31%為女性。就生理上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加強壯，在類似的情境下，女性有更高的機會成功抵抗和生存。另外，家庭內部的社會結構和性別動態顯示了家中男性的健康總被排在第一順位，或許當女性有症狀時，他們根本沒有快篩。

除了性別之外，在有確診的群體中年齡落在25至29歲的人有四成，代表越有行動能力、越常暴露在戶外環境的人同樣也越容易受到感染。不幸的是，部分人家中有成員因為疫情而死亡。在我們的研究中，多數的死亡案例(88%)皆住在多層建築中，僅有12%的比例住在獨立私人建築。同樣我們也觀察到，67%的死亡人口生前從事服務業、26%為自僱人士，其他並未透露職業。無論來自何種社會背景，所有受訪者都不願意做病毒的檢測。當問到他們如何得知自己確診時，多數人表示他們有出現相關症狀，因此判定自己感染了病毒。當問到他們為何不透過快篩來確認自己是否為陽性時，他們的回覆不一，包含缺乏檢測設施知識(27%)、沒有得到醫護人員建議(12%)，和最重要的因素，害怕因為確診帶來的社會污名(59%)。

由於病床和其他醫療資源的缺乏，在狀況變得嚴峻之前，人們偏好待在家中養病。資訊和資源取得的不足是尋求醫療協助的主要障礙，也是阻礙HSB在社區內發展的原因。因此許多人選擇服用居家常備藥(大約27%)，部分透過電話與醫生諮詢(16%)，少數前往診所(11%)，相對多數的比例(46%)僅依靠朋友、家人和，想當然，數位媒體的資訊。

確診者會被建議進行自我和居家隔離，但這樣的行為在印度社會並非常態。事實上，感染者因為害怕隨之而來的污名而不願向社區透露他們的狀態。

根據我們的分析，我們認為儘管人們已經準備好遵守HSB的規範以應對 Covid-19，他們同時也受到資訊不足帶來的影響，這是HSB最大的阻礙。因為恐懼和無知，人們不願意在生病初期就尋求醫療協助。因此眼下的當務之急便是提供衛生教育以促進HSB，尤其是在像比哈爾邦這樣未開發的地區。

> 回顧

Covid-19仍持續對公共健康造成威脅，相關的衛教實作應該以永續、被社區所接受為目標。根據我們研究的發現，我們發現社會急需透過衛生教育進行的社會干預以在社區內發展HSB，並且這件事是必須被實施的。將健康教育作為衛生政策的一環，此一綜合方法將有助於社區中行為的改變並有效促進健康。

我們近期的延伸研究顯示在 Covid-19 之後，人們開始更多的關注衛生和健康相關實作。衛教的加強和對健康交流的投資使人們發展出對HSB新的社會理解，這將促進一連串的健康提倡過程。這將使人們有能力面對自身的健康問題，並且克服現有的健康差異。因此，健康教育是當務之急。■

來信寄至：

Aditya Raj

<aditya.raj@iitp.ac.in>

/ Twitter: [@dradityaraj](https://twitter.com/dradityaraj)

Papia Raj

<praj@iitp.ac.in>

> 西班牙的心理健康：社會學如何重要

Sigita Doblyté · University of Oviedo · 西班牙



來源：Adrian Swancar · Unsplash。

目前與心理健康有關的政策，大多被歸入醫療範疇當中，屬於國家體制的一環；同時，心理健康也與個人文化、社會關係與人格息息相關，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我認為，社會學可以很好地協助人們理解心理健康與相關困擾。如今的世界正面臨許多因文化再生產以及社會整合而產生的問題，而人們也因失去文化定位、異化等而產生心理健康困擾。因此，我們應該在處理心理健康議題時賦予社會學更重要的角色。雖然這篇文章中，我的論點將以西班牙為中心，不過本文應該也會讓其他國家的讀者產生共鳴。

過去一年中，西班牙的心理疾病議題，引發了前所未有的關注。政治人物、記者和倡議者都提到，根據國內外統計資料，西班牙的心理健康狀況有惡化的趨勢——自殺死亡率不斷提升、抗憂鬱藥物使用量過去20年間增長三倍，為歐洲成長幅度最高的國家

之一、抗焦慮藥物使用量也是全球最多。2022年，一份針對西班牙公部門員工心理健康的調查，試圖解釋上述現象的原因：近一半的人坦言，自己依賴心理藥物來緩解工作焦慮。

這些統計資料反映出心理健康議題不只是個人問題，也涉及社會過程。然而，媒體仍舊將鏡頭交給精神科醫生和心理學家，而不是社會學家。即便心理學和精神醫學在協助個體面對心理困擾時，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相關人士經常受到生物醫學模型的世界觀限制，在處理此類情況時將問題去脈絡並個人化。舉例來說，醫學專業人士給出的結論，常常只是：我們應該增設更多心理醫療資源——這當然也很重要，但我覺得應該會有其他更好的解決辦法。

> 文化與自我價值

文化確定性分為公共的與個人的，前者的再生產是透過社會關係和制度進行，後者則藉由社會化的過程實現，以哈伯馬斯(1987)的話來說，我們的期望、決策與行動都是為了確保自己能擁有「足夠的知識一致性，以應對日常實踐」。在新自由主義的文化之下，強調競爭、物質成功和特定生活方式的自我腳本越來越多(Lamont, 2019)，人們定義「好的生活」的方式也走向同質化，生產表現和消費變得比其他社會價值還要重要。

在這樣的腳本下，那些虛幻的目標，被描述成是人人可以藉由努力工作實現的。這又導致了「贏家」和「輸家」的分類——贏家努力工作並追求自我，而輸家則缺乏這種能力。然而，即便努力付出，這些自我價值的衡量標準，並不適用於每個人。在西班牙，出生在富裕家庭，就等於是取得了龐大的優勢。相較之下，如果生在貧困家庭，不管多努力學習、工作，成功的機會比起前者便要低得多。

這些以物質成功為核心的文化腳本，早已內化至人們心中，大多數人也確實根據這些腳本來構築

>>

對未來的想像。其中，許多人並沒有機會在現實生活中，過上想像中的美好人生，卻又發現有些比較幸運的人，可以輕鬆地生活。這種想像和現實之間的落差，可能會引發某種因文化而生的情緒，如危機、悲傷、憤怒或羞恥。我認為，失去對未來的信念，是通往不幸的最直接途徑之一。

> 工作與社會關係

除了物質上的匱乏會帶來痛苦，社會學指出，人會因其職位而產生痛苦。舉例來說，一位年輕學者多年來努力求學、認真研究，而這段期間，有人承諾他只要努力，一定會有安穩的工作，也會受到其他人肯認；最終，這位學者卻無法找到足夠「體面」的工作。即便處於相對優勢的地位，他也會痛苦。西班牙的調查顯示，除了薪資不平等之外，工作相關變項也與心理困擾有關係，例如認為工作缺乏意義、沒有目標等。

若能藉由制度在工作環境中提升員工的自主權、尊嚴與受到的肯認，並增加組織成員間甚至組織與組織外的人之間的團結程度、使其付出能獲得獎勵，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會縮短，員工的幸福指數也會提高。工作變得有意義，也會促進生活世界的社會整合。然而在西班牙，員工的自主權、尊嚴與受到的肯認低落，工作環境明顯惡化，心理困擾隨之增加，這些現象已經引發了不少關注。

不過，非正式社會網絡的團結，有助於緩解因工作而引發的困擾，特別是在家庭文化強烈，但非家庭網絡較弱的南歐社會中。雖然這樣說，但是在西班牙，不管是家庭網絡還是非家庭網絡，所有社會關係的功能都下降了(Ayala Cañón 等, 2022)。這件事在疫情爆發前就已經發生，隨著疫情加劇，情況又變得更糟：人們與朋友和親人見面的頻率降低，社會和情感支持減少，感到更孤單了。

由上可知，文化領域中的困擾，將導致人們失去文化定位，而社會關係的中斷——無論是工作關係還

是非正式社會關係——則導致個體間更為疏離。這又回過頭來造成人們在社會化過程中長出的期望，和生活中的現實情況不符合，其中又有些人的生活比其他更難以適應，最後產生了心理疾病。

> 關於體制

最後還是得說，雖然這篇文章關注生活世界，不過社會學還是應該以將社會的兩個層面連結為目標，其中，體制及其經濟、政治—官僚領域「必須滿足社會文化生活世界的維持條件」(哈伯馬斯, 1987)。雖然說心理健康服務確實能減輕個人的痛苦，但這已經超出其範圍了。不過，在目前的情況下，個人還是得回到異化、缺乏意義的生活世界中。

如果不擴大價值體系的評價標準，讓更多人能感覺自己有價值；如果不改善勞動關係和工作機會，使人們能在工作當中得付出得到回報；如果不提倡住房、家庭等社會政策，以促進、傳遞特定的價值秩序——如果不改善那麼這些在西班牙相對薄弱的關鍵因素，那麼前述的困境便會持續。意即，在面對異化、無意義的生活世界之時，能求助的對象又只有治標不治本的心理健康照護系統，是一個惡性循環。

作為社會學家，我們有能力解釋這些過程，並將其呈現在檯面上。過去的社會學研究即便涉及心理健康、疾病，往往侷限於醫學社會學，而打學科領域的藩籬，在研究此類主題時將其他領域如文化或經濟社會學，對知識和實踐來說是極為有幫助的。我主張，是時候加強不同社會學子學科之間的對話了。■

參考文獻：

- Ayala Cañón, L., Laparra Navarro, M. and Rodríguez Cabrero, G. (eds.) (2022) *Evolución de la cohesión social y consecuencias de la COVID-19 en España*. Madrid: Fundación FOESSA.
- Habermas, J.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Vol. 2.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Lamont, M. (2019) "From 'having' to 'being': self-worth and the current crisis of American socie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70(3): 660–707.

來信寄至：

Sigita Doblyte

<doblytesigita@uniovi.es>

> 透過識別隱性暴力 擴展人權論述

Priyadarshini Bhattacharya，印度政府行政服務官員



來源：巴西藝術家 and 政治學家 Ribs (twitter.com/o_ribs 和 instagram.com/o_ribs) 為社會理論和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社會運動觀察站創作的插圖「我們希望彼此活著」。
來源：Ribs，2021。

人權範式是一種以深度同理心看待世界的方式，它建立在人類生命是有價值且具尊嚴和意義的基本預設之上。這個範式因為歷史上男女所遭受的暴行經驗，而有了結構上的改變。然而，如同每個範式，它起源於特定的歷史背景；在這個情況下，主導著法律實證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知識潮流，優先考慮將客觀經驗主義和脫離實體個體作為主題。此時正是進一步豐富和擴展人權範式輪廓的時候，透過認清交織性和情境知識在理解性別暴力的疊積性本質的價值。任何僵化的跡象都必須促使我們發展出一個更細緻、且針對具體情況的國際人權習慣法，以關注隱蔽的文化暴力和根

深蒂固的偏見，這些偏見使這類暴力下的倖存者的主觀詮釋受到限制和噤聲。

> 人權論述未能解決的性別暴力難題

本文闡述了在解決性別暴力時，現有人權論述以及相關社會法律文書的不足，特別是當性別暴力具備潛伏的性質，使得這些事件發生在「和平時期」。再者，擴大人權論述的必要性在於辨認出暴力的不同形式，它們往往超出了可量化的經驗範圍，但仍舊是潛在且根深蒂固的暴力，因此需要不同的工具來衡量。最後，呼籲人權捍衛者和法律機構將注意力轉移到日常化的潛在性別暴力形式，同時培養必要的能力和責任感以提供救濟。

若將性別暴力視作一個光譜或連續體，它橫跨了壯觀和平凡、跨越了奇異和平庸。在人權框架下所提及的性別暴力，包含隨機殺人、將性暴力視作戰爭策略、人口販賣和其他類似的殘暴行為，由於它們發生在衝突地區，而引起了國際社會和民眾的憤怒。然而，象徵性(Bourdieu, 1970)和潛意識暴力的概念作為一種工具，帶著我們將目光從嚴重且明顯的暴力形式轉至低強度、隱晦的暴力「運作形式」上；這類的暴力往往在「和平時期」發生，但會在衝突或危急時期達到臨界點。[Scheper-Hughes](#) 和 [Bourgois](#) 在他們的研究中使用「日常暴力」一詞，來強調社會對性別暴力倖存者因體制下的進程和對話而遭到的傷害的漠視。

當代的狀況使我們必須面對暴力的複雜性，特別是在私人領域和政治領域間界線越加模糊下的性別暴力疊跡性(palimpsestic)。在「和平時期」發生的較為隱晦的性別暴力，因為不像外顯的暴力那般容易衡量，所以較不容易受到政策層面或法律層面的關注。無法被確切量化的部分經常被噤聲或遺忘，並且被排除在討論和辯論之外。正如 [Gayatri Spivak](#) 所說，量化限制了我們所能看到的，也抹去那些「無法被定義」的部分。

> 使日常暴力被看見的女權認識論與其背景

實證主義在追求科學性的過程中，一直在試圖發展可量化的指標。人權論述通常將重點放在戰爭地區中所發生的有形傷害和外顯暴力，透過普遍性和發生率嚴謹的估量一個地區所受到的破壞和反常行徑。因為歷史上，人權範式與實證主義方法論、新自由主義的量化特性之間緊密的關係，使它無可避免的傾向忽略豐富且詳盡的論述。由此導致的「[稠密描述](#)」或「反論述」體現在日常生活的經驗中，要求以本體論打破狹隘的經驗主義，並轉向解釋女

權主義立場，它承認被侵犯者主觀經驗的有效性，且允許他們對自己的經驗進行文字化、分類，從而進行衡量。[Cecilia Menjivar](#) 以他敏銳的洞察力撰寫了瓜地馬拉東部的民族誌，記錄了拉帝納女性遭受的隱晦暴力的具體經歷，生活在每天被貶低、羞辱和蔑視的微觀環境下，導致殺害女性的可怕行徑出現。[Menjivar](#) 通過記錄女性對自己痛苦常規化 *aguantar* 的觀察，從常態的角落裡找回了文化上被視為「習以為常」的暴力。

透過承認特定認識主體的社會和歷史背景，女性主義立場知識論為那些一直以來「缺席的主體」創造出空間，並取得她們的「[缺席經驗](#)」。這樣的方法論促使利害關係人更容易被看見，他們不再被量化系統排除在外，並且也得到了知識權威。以法庭程序或審理的形式主義為例，當受虐待的倖存者在法律代理人冷靜的態度下被要求有條理的描述是否存在任何「證據」證明所遭受到的暴力行為，考慮到她的行為和現狀所表明的明顯「同意」。人權立場應剛進一步探究，並且以女性經歷的「隱性說服」的特定範疇為背景，其中最無情的例子便是單純由「[事物的秩序](#)」所施加的說服。

當司法機構和法律執行者以及「[象徵權力](#)」的擁護者具有根深蒂固的偏見，並以未經反思的預設立場來作出「裁決」時，不公正就會出現無法辨識、無法表達並成為制度化的現象。

> 改變社會現實的新方法

要求社會去接受「無法感知的事物」並不脫離實際和法律上的複雜性，更不用說道德困境了。在這方面，女性主義研究經常忽略了象徵性暴力，將其視為一個過於模糊且難以辨別的類別。然而，人權的法定化永遠不是一個全面且詳盡的過程，而是需要以不同的測量工具，並且不斷受到持續變化的社會力量和實證發現的啟發而進行調整。

朝著將日常象徵性暴力法定化並進行制裁此方向邁進的基礎是 [貝倫公約](#) 和 MESECVI 示範法，它們都在努力的實現此目標。公約的第六條承認了女性的「免受歧視的權利，免於受到因為文化刻板印象和慣例而被視為低人一等、被指定固定的行為模式的權利」。

在南亞地區一個有力的例子是與父權體制下「品德」和相對應的「恥辱」相關的「品德犯罪」，這控制、引導和規範著女性的性行為。然而，針對那些涉及對女性及其家庭進行的社會排斥，並導致他們實際上「社會性死亡」的低強度暴力形式，很少受到任

>>

何提及或國家明確的譴責。事實上，這樣的行為是合法的，且法律代理人又進一步壓制了它們的能見性。

> 對人權進一步的承諾

被隱藏的暴力形式有效地被現有的意識形態敘事、習俗和制度所內化和支持。人權論述必須關注那些不明目張膽，而透過日常順從的方式產生的暴力，這樣型態的暴力是由深植文化的意識形態和歷史上受到支持的「計畫」所導致的。

這些潛在形式的暴力藏在「正常」社會實踐的表面之下，它們因為可能造成隱性的傷害，而需要從規範性的空間、實踐、制度的過程和互動中被提取出來。因此，對人權進一步的承諾需要以一種關注婦女在特定文化背景中所經歷的非對稱性別關係中的隸屬和政治的嵌入性語言來體現。這些文化背景往往合法化慣性和再生產，從而使日常再現變得正常化。所以，這些未被宣揚出的「輕微」不公正行為需要不同的衡量工具。

反身性和批判文化分析的視角必須完善人權論述，以認知到日常生活的平凡性將可以孕育強大的性別暴力形式。鄂蘭的「[邪惡的平庸](#)」只是提醒我們「[歷史上最不公義的時日](#)並不是由極端份子或精神病患所造成的，而是由普通人——可能是你和我——因為我們接受並順從了現有的秩序」。沈默和接納確實是再生產不平等權力關係的有效機制。

一個不成熟的人權論述可以反映出的，不僅是國家的沈默，也是[集體良心的沈默](#)。女性主義的認識論和檢視「日常暴力」的工具可能為人權範式提供另一個視角，更能容納我們「認識英雄」的「更深沈」的沈默和被壓抑但被回朔的聲音，他們必須從狹隘的經驗主義的經驗壓迫中崛起。將人權重新定位為認同政治——通過傾聽的方式，使日常被隱藏的不公義被看見——將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它將有助於為那些帶著無形傷口的敘事者進行集體療癒。■

來信寄至：

Priyadarshini Bhattacharya

<priyadarshini.bhattacharya@gmail.com>

/ Twitter: [@BhattacharyaIAS](#)

> 由 Khaldun 觀點談俄羅斯侵烏

Ahmed M. Abozaid,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英國



來源:Vitória Gonzalez 創作的影像蒙太奇, 2023。

穆 斯林學者、政治家 Ibn Khaldun (1332-1406) 已經在全世界的社會科學領域中受到關注。他的跨學科研究為經濟學、金融學、城市研究、人文地理學、歷史學、政治理論、衝突研究、哲學和國際關係等領域貢獻良多，而這些僅是其成就的冰山一角。他的著作《al-Muqaddimah / 前言》和《Kitb al-‘Ibar / Ibn Khaldun 的歷史》收錄於 Barthélemy d’Herbelot 的《Bibliothèque orientale》一書中，於1697年以法語在西方出版。如今，Ibn Khaldun 的作品已被翻譯成許多語言，多位學者更將他視為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

2022年2月，俄羅斯對烏戰爭全面升級時，我正在撰寫一篇以 Ibn Khaldun 和國家暴力研究為主題的博士論文。身為政治學家，再加上我的烏克蘭伴侶和家人都身在Kyiv，這次的暴力事件對我來說的衝擊很大。我跟很多人一樣，仍在嘗試理解這個新的、充滿敵意的現實世界。對於人們——尤其是所謂的「西方」專家——總是將戰爭理解得太過簡化、解讀得不夠深入，我常感到沮喪。在閱讀了 Ibn Khaldun 的著作後，我立刻理解了侵略的動態性，以及俄羅斯政權對烏克蘭實施的國家暴力有多麼嚴重。我

將在這篇文章中與你們分享這些思緒，並強調Ibn Khaldun 的思想對於解釋當今迫切的全球社會政治困境如何重要。

> 由 Khaldun 觀點出發

原則上來說，許多全球政治衝突的源頭，是17世紀以來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與隨之而生的國家體系。在兩者的形成過程中，許多問題衍生，並從未被處理。從 Khaldun 的角度來看，若著眼於社會政治與社會經濟的結構，便能從中觀察到「asabiyya」（統治菁英）具有的特性，以及權力結構如何在現代社會中形成——特別是這些結構如何被特定的暴力和壓迫鞏固，以維護統治精英的權力和支配地位、控制生產手段並壟斷暴力。這些概念將幫助我們理解，國家向外部、內部發動暴力的動機與目的，即是協助統治菁英獲得／保持政治權力。藉著重新關注 Khaldun 對權力結構形成的分析，我們得以更好地理解當今全球政治的治理與正當性危機，並釐清自由民主何以走向軍事暴政、威權主義、君主制政權，了解大國間如何走向競爭。這番思考也使我開始更關注過去發生的事情，並意識到如今的國際體系中的政治與法律結構，具有現代和前現代的混合特性。

>>

Khaldun的觀點關注特定王朝中佔據支配地位的集團、愛國主義、寡頭統治等勢力如何生生不息，並指出團結的社會團體為了保護其統治精英、控制生產手段並擺脫可能對其造成威脅的對象，如何在內部進行權力鬥爭。這樣的動態關係，使得國家中容易產生敵視「所有其他國家」的態度，形成某種零和的思考方式。舉烏克蘭來說，普丁當時便計畫要建立一個新的跨域政權，除了擴大基於身份認同的「asabiyya」在後蘇聯地區的影響力，還要「盡asabiyya所能」去應對以歐盟和北約為首的外部對手。

> 普丁的「asabiyya」

普丁領導著俄羅斯的「asabiyya」，將政治定義為以暴力和脅迫來實施統治，並使用 ghalbah 和 qahr，意即謀殺或酷刑等殘忍手段，來消除和削弱可能危及「asabiyya」正當性與權力的對象。換句話說，普丁正藉著在國內鎮壓反對派、國際上發動帶有擴張主義的戰爭，來將隨「asabiyya」崛起而生的過剩物質與象徵暴力施展出來。根據 Ibn Khaldun 的觀點，一旦「asabiyya」確立自身於國內的優勢地位，其就會開始以統治他人、擊敗較弱勢的團體以鞏固權力為目標，從而破壞並消解其他敵對統治菁英群體的凝聚力，以免自身的勢力減弱。

普丁政權如今未能在烏克蘭取得勝利，也無法破除烏克蘭的反抗精神，這樣的命運，同樣可以用 Khaldun 的理論框架來解釋。Ibn Khaldun 指出，特定政權最害怕的，其實是「asabiyya」的解體，導致其最終不再能構成、維護和捍衛該政權。之所以會解體，是因為其影響力（即強制征服他人的能力）削弱，財政權力下降便隨之而來，最終政權覆滅。此外，正如 Yassin al-Haj Saleh 所說，普丁的失敗有很大機率會終結自身的政治生涯。這對白俄羅斯、中亞和中東的獨裁政權來說也不是什麼好事，因為這些政權的生存和穩定，都有賴於普丁跨域政權的支持。因此，隨著普丁侵略烏克蘭失敗，敘利亞阿薩德這類的野蠻、反叛政權也將隨之衰落。

> 改進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解釋

綜上所述，將國際體系內的衝突和危機，全數歸因於特定暴君的殘暴行為，並忽視經濟、政治、戰略等因素對國際和當地局勢的影響，並不符合 Khaldun 的觀點，且是一種錯誤。事實上，針對俄羅

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以及其他地區如敘利亞、中國、美國、以色列等國此一現象，Ibn Khaldun 指出，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統治菁英（曾經或仍然存在的特定集團和社會力量）的角色與功能，並結合其他系統性的線索，以便理解統治菁英如何協助暴力政權建立並維護其權力結構。藉由對國內公民以及其他國家施予暴力、鎮壓行為，這些政權的正當性受到鞏固，並能進一步擴展其統治。

不幸的是，學者們在試圖想像如何擺脫當今國際政治中暴力的惡性循環時，往往忽視了這種創新的觀點。不過，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透過 Khaldun 的框架，我們有機會能對國際關係理論進行批判性的檢視，並重新分析全球案例。自2008年普丁取得絕對權力以來，俄羅斯的侵略事件仍持續地發生，而這套邏輯將能夠彌補解釋這些事件時，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不足之處。現實主義過度地關注權力平衡、安全與地緣政治因素如何影響由民族國家主導的國際體系，以及如何避免戰爭、保持和平。而 Ibn Khaldun 的理論不會被侷限於此，其將藉由關注權威建構過程的動態，以及社會團結群體（如「asabiyya」）的集體思想，來把黑盒子打開。新自由主義太過重視國際法、制度安排，以及安全共同體思想如何透過提供寶貴的合作資訊來協助決策——這套理論也挑戰了這種論點。絕對收益更強調的，是利用制度來降低國家的不安全感，而「asabiyya」的相對收益邏輯取得了支配地位，其將使得絕對收益的優先性降低。■

來信寄至：

Ahmed M. Abozaid

<a.ahmed@soton.ac.uk>

/ Twitter: [@AbozaidahmedM](https://twitter.com/AbozaidahmedM)

